

# 再思 1949 年分水岭 ——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

[美]裴宜理 李里峰 等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5.01.001

编者按:20 世纪中国历史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帝制终结的 1912 年,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以及改革开放的 1978 年。这些时间节点,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化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多少遮蔽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某些共相特征,使人们不易见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其中最难逾越的是 1949 年这一分水岭,它又和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学科畛域交织在一起,使情形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跨越时间界限、突破学科畛域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并作了有益的尝试。哈佛燕京学社为此举办以“再思 1949 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为主题的工作坊,邀约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十余名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围绕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鉴于工作坊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为扩大跨时段、跨学科研究路径在中国学界的积极影响,特将会议纪要完整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 开场辞

柯伟林(William Kirby, 哈佛大学):中国的世纪?20 世纪之再思

我要特别感谢里峰组织这次会议,并邀请我做开场致辞,我对此深感荣幸。不过很可惜,我一点钟要去商学院上课,所以不能参加下午的会议了,非常遗憾。

首先让我从一些非常宽泛的讨论开始。面对诸多的政治分歧,我们该如何思考 20 世纪?提到 20 世纪,我首先会想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我最欣赏的一个女人——慈禧太后。在座有些人知

道,当我在哈佛(文理学院)做院长的时候,我办公室外面有一张很棒的慈禧太后的肖像,是一位出色的荷兰画家在 1905 年画的。慈禧不喜欢这张画,因为画中自己看起来太老了,最后这幅画到了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但我把它挂在我办公室外面。我记得在接待温家宝总理的时候,中国大使到我办公室来——要进我的办公室,不可能看不到这张巨幅画像——并问我:“为什么你在办公室挂了这么糟糕的一幅画像呢?”事实是我有一种好古癖,但我又说道:“大使先生,你知道,如果她是一个男人,你也许就不会认为她这么糟糕了,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她,也许就不会有

\* 本文系根据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举办的“Rethinking the 1949 Divide: Dialogue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工作坊(波士顿,2013 年 4 月 26 日)录音整理而成。会议录音由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生 Jeffrey Javed 誊录为文字稿,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生童琳琳、任华中译为中文,最后由李里峰校阅、定稿,部分记录并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这个国家。”我想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慈禧太后和其他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能够完整地继承清王朝的全部遗产，这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历史延续性。如果审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其他帝国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是、也确实是每一个都灭亡了，只有大清国是例外，它现在化身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正如我们所知，大清国将被中华民国取代。我们现在还知道，当中华民国在 1911 年、1912 年建立时，对中国的未来有一套宏大的抱负和愿望。你可以在魏德纳 (Widener) 图书馆找到相关资料，像《中国崛起》、《中国攀升》、《巨龙醒来》、《孙中山与中国崛起》之类。1915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袁世凯的好书，从一种积极、正面的立场，阐述了中国是如何在这位强者的带领下走向团结统一、跻身世界强国的。今天，你去任何机场售货亭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书：《中国崛起》、《巨龙醒来》、《中国攀升》、《当中国统治世界》，以及我们的毕业生葛凯 (Karl Gerth) 撰写的《世界随着中国动》。我首先得声明，众所周知，这些书大部分都是垃圾，你们用不着去读它们，而应该等我明年年初将要出版的书。

让我们回到 20 世纪，看看袁世凯和其他人。虽然还不是谈论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的承诺的时候，虽然当时还没有被普遍意识到，1913 年的选举实际上是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自由、最公平的选举。尽管如此，它被随后的一系列军事领袖所取代了。胡锦涛在当了两年主席和总书记之后，终于得到了军委主席的职位，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我想说的是，也许很容易把 20 世纪中国政治生活的军事化看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这种军事化却在如下意义上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到 1945 年——不是 1995 年、2005 年或者 2015 年——中国已经是一个军事大国，中国的军事化使它能够保卫自己的边疆。日本在 1894 年、1895 年一夜之间击败中国，那么多年过去了，它却不能在八年战争中打败中国。西方列强在 1900 年用一小支部队就彻底击败了清朝，但是到 1925 年、1926 年，当北伐部队开始进军时，他们却无法鼓动人心或兵源去干涉革命。关键在于，中国当前的实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不是 1970 年代，不是邓小平以后的事情，它已经酝酿了一个世纪。

从商业来看也是如此。如果看看 1909 年的南京路或 1930 年代的上海，当时它已经是东亚的国际化城市，大都会，商业之城。相比之下，香港简直就是一个可怜的饱受殖民统治的闭塞之地，东京、汉城亦是望尘莫及。上海还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中产阶级或至少中产阶级精神的发源地，尽管这些都被战争和革命所中断了。几年前，我在亚布力举行的第十届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发言，马云、陈东升和其他许多民营企业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他们谈到当前盛况——他们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起源时，论坛主席、泰康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说，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十年是从 1927 年到 1937 年，他们事业的基础是清末民初的模范企业家们奠定的。

再看看共和国早期成长起来的杰出企业家们。我在哈佛商学院的案例之一是杭州万向集团的创始人鲁冠球。他出生在民国时期，天生就是做商人的料。作为一个商人，他碰巧遇上了中国历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他试图在大跃进高潮时期开始做生意，后来证明这不是个好主意，并使他陷入巨大的政治麻烦。鲁冠球在 1969 年尝试创办了一个社队企业，这就是万向集团的雏形。企业决定生产拖拉机犁，1979 年开始在一个人民公社生产汽车万向节，这是万向集团的前身。如今它已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家族企业。他的儿子负责杭州的大部分生产，一个女儿负责另一家公司，女婿则掌控着北美的业务，包括 25 家汽车厂，并刚刚收购了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 (Waltham) 一家主要的电池公司。万向集团是一个全球性公司，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公司，事实上占据了 60% 的中国市场和更大比重的国际市场。他的梦想起源于民国时期，却在 21 世纪最终成为了现实。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成功——当然，他是个聪明人，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感谢政府，尽管这个政府曾经数次把他送进监狱。这是他拿着一个万向节的照片——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万向节的话，它是一种汽车配件，我常常得向本科生们解释，它不是某种用来吸烟或者传送的东西。他非常感激政府，但是如果你问他：“鲁先生，你为什么成功，你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会说：“有人种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延续性，是一种遗传学

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繁荣,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根源。

我昨天在本科班上讨论了正大集团,我们会进一步了解它。正大集团和 Elisabeth(暗指 Elisabeth Koll)深入探讨过的荣氏集团非常相似,它有一个大规模、多元化的家族产业,并根据一套家族规则管理企业,是海外华裔创办的最大的农业企业之一。

继续观察其他具有延续性的领域,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孙中山,他也许算不上现代中国之父,但我想他至少是现代中国基础设施之父。这是他在 1921 年为中国现代铁路网络所做的规划,大家知道,它至今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些铁路并未贯穿外蒙古,个中缘由非常复杂。我们可以看看过去十年间北京地铁的发展,再想想波士顿地铁将迎来的最大投资——建于 19 世纪的绿线(green line)将会延伸 4 英里到梅特福德(Medford)。毫无疑问,在长江三峡修建一座大坝也是孙中山 1921 年的想法。这条公路是喀什到乌鲁木齐公路网络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主意),手机在这条公路上可以正常使用,而我每天穿过山丘返回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Belmont)时,这部手机却无法正常使用。

当然,我们探讨的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妨看看明朝的道路系统,或者国民党的高速公路网。孙中山有一个梦想——拥有 10 万英里的铁路和公路,汽车制造成本低到人人都能拥有一辆。他的梦想今天似乎正在变成现实。但即使是他,也没有打算建造一座跨越台湾海峡的大桥,这似乎是中国交通网络下一步的规划。

说到通讯、电信,我们课程里有一个案例是关于中国移动及其出于企业社会责任而将每一个村庄连接起来的方案。这是一位快乐的老奶奶,一位快乐的农民,正在了解最新的农业进展和相关宣传。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因为它既是信息延伸的手段,又是政治渗透的一种形式。现在云南农村的每一个村支书,都可以用自己的手机连接到仍然存在于每一块田地里的旧广播喇叭,所以他们每一个愚蠢的想法都能在片刻之间与人分享。为了测试这个系统,我有次——大概四、五年前——去拉萨,想看看我的手机在这个拥有丰

厚遗产和新兴基础设施的地方能不能用,我猜想也许会由于政治原因而无法使用——但是,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看农业。这是正大集团的工厂,一个广东人家庭在 1921 年自己的村庄被台风摧毁后,移民到泰国并在那里创办了一家种子公司。现在它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他们正在改变中国每一个省份的农业和垂直供应链,就像他们提出的口号——“从农场到餐桌”。在我和包弼德(Peter Bol)尝试开设的课程中,我们想去拍摄他们的工作。昨天晚餐时,这个家庭建议我们去参观他们北京郊外的家禽养殖场。我想我们稍晚再去吧。再次注意,这些人从 20 年代就开始涉足农业生意了。从 70 年代起,他们就成为活跃于中国每一个省份的独立公司,因为没有一个是全国性的鸡和鸡蛋市场。从他们掌控的莲花超市到人们交口称赞的绿色健康鸡蛋,他们其实是食品安全的典范,只是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乳品行业同样如此。一开始它当然是在通商口岸为外国人服务,但是现在伊利乳业这样的公司改变了经营模式,其主要任务就是不让内蒙古的奶牛像这样漫无目的地转悠。他们已经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做了许多认真的工作,实际上可以追溯到 1920 和 1930 年代在满洲和内蒙古的一系列实验。甚至有一位著名的哈佛毕业生,1918 年打算在满洲创办一家大奶牛农场。他不幸被土匪杀害了,但最后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奖学金,他的努力终有成效,一些人被送到中国——但不是送到奶牛农场。伊利及其他公司已经说服数百万不喜欢牛奶(其中 63% 的人还有乳糖不耐症)的中国人去喝牛奶,而且非常成功。

我们还有一个关于中国葡萄酒产业的例子。红酒正在成为官员宴会的饮品,我想即便习近平提倡的“四菜一汤”也不会把红酒排除在外。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葡萄酒市场之一,如今是世界第五,但它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1904 年,爪哇华侨张弼士在清王朝建立了自己的酒庄,到 1912 年和 1915 年它已是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并在 1915 年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赢得了由威尔逊总统颁发的四枚奖章。威尔逊不喝酒,所以我们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出评判的。总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

但是最后我还要讲一讲高等教育。上个周末我在清华,它可以追溯到 1911 年的留美预备学校,其雏形基本上是一所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今天中国的每一所重点大学都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但在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其道德基础在许多方面同样来源于民国,清华大学就是如此,它正尝试重新成为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曾经并不仅仅是一所工程学校、技术学校,而是 1950 年代才变成这样的。它曾经是一所出色的综合性大学,拥有出色的历史系,1930 年代初,费正清(John Fairbank)就是在这里跟随蒋廷黻学习中国历史的。如果去访问与南京大学毗邻的东南大学,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是由蒋介石创建的作为世界顶级大学翻版的前国立中央大学——当时的顶级大学不是哈佛或其前身,而是柏林大学。这座建筑建于 1930 年,大家知道,它是仿照柏林大学的,因为有一个壮观的勃兰登堡门,你走进校园时就会见到,今天依然如此。

所有这一切,的确在许多方面推动事物向前进。这里即将成为华东师大崭新、宏伟的新校园——这要归功于张(济顺)教授——这个校园仿佛是一夜之间建起来的。这是浙江大学的新校区之一。至于私立大学,例如西安外事学院,这位绅士(暗指黄藤)拥有学院 55% 的股份,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任期。中国大学的全球排名以这种方式迅速上升。最近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也促使我们驻足反思。中国人认为这所大学——哈佛——向来是第一。一百年前,我们和第一还差得很远,甚至排名能进前 20 就很幸运了。今年,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我们是第四,在斯坦福和麻省理工之后。世界在变化,而且非常迅速。中国的大学正在重新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致力于重现 1949 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系——规模虽小,却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体系之一,具有强大的地域扩张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其他地区都在中国建立校园——中国人来哈佛,而其他地区来中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中心设在北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哥伦比亚大学也在北大,芝加哥大学则在人大。昆山杜克大学或许是最不寻常的冒险。这似乎就是世界的走向,但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有它自己的一套根基。杜克的合作伙伴是武汉大学,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作为张之洞自强运动的一部分创建于 1893 年。

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全新的。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再想想 1930 年代的上海。1980 年代我在上海,我记得 Liz(暗指 Elizabeth Perry)当时也在上海住了一年。除了脏和破,那时的上海确实和 1930 年代没有多少差别,因为没有什么新的建筑。如果你看过《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这部电影——它拍摄于 1987 年,但场景设定在 1937 年——当时延安东路只有一幢建筑,要不然你也可以拍同样的电影。我还记得当我们在上海社科院的时候,张仲礼教授给我们讲述上海的辉煌岁月,并说:“那时上海就像纽约一样,Kirby 教授,Perry 教授,它将再次变得像纽约一样。”1992 年我曾看过浦东的模型,当时我想:“这太疯狂了,毫无疑问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它就在那儿,我们就在那儿,我们(哈佛)唯一的国际大学中心就在那儿。上海不仅仅是像纽约一样,你可以说它是某种逝去了的纽约,但事实上,它建立在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重要历史的基础之上。

好了,让我在这里打住,转向我们的论文吧。

#### 第一场: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特里尔大学):  
中国国家干预经济的起源:民国规划者、根据地经济与苏联模式

首先我要感谢李里峰组织这次会议,感谢 Liz Perry 让我们聚在一起,感谢 Lindsay 的精心准备。我其实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学者,所以我尝试从政治学的角度去观察一些历史问题,我想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宏伟目标和国家干预,这里确实有某种延续性,但也确实存在严重的断裂。它也以某种方式回到 Bill Kirby(暗指 William Kirby)的历史当中,去追溯国家干预这种雄心的起源。

为什么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似乎忽略了国家干预和发展规划?这不再是一个大问题,自从 1990 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接近枯竭。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西方社会科学非常重视这种转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从国家转向市场、从计划转向市场,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

果推展开去,我们会发现——这正是我近年来的研究——发展规划事实上已在中国重新恢复活力,而且更加雄心勃勃。约束性指标曾在 1990 年代中期一度被弃用,但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又被重新引入。我曾有机会与许多制定最近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政策的人交谈。所以对西方社会科学来说,理解国家干预的这种独特路径——中国路径,或者他们所说的“宏观调控”,是一个非常主题。

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对此存在巨大的争论。传统的观点非常明确,认为中国完全是模仿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随后又出现了其他的看法,其中之一(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观点)是由 Kirby 教授自己在 1990 年代提出的,主张追溯到孙中山关于中国基础设施的想法,以及民国时期的规划者(尤其是国家资源委员会),正是他们为中国系统化的、井然有序的规划奠定了基础。它跨越了 1949 年的鸿沟,因为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许多民国规划者事实上被陈云领导下的共和国规划者所接替。Kirby 教授在他 1990 年代的文章里提出了许多证据,表明从民国时期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到 1950 年代初期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存在着组织上的延续性(国有企业)、政策上的延续性,但最重要的是人事上的延续性。关于这个问题确实有争议,最近台湾有一个好的研究——我不能说太多的细节,以免离题太远——重要的是最近有许多研究是对此表示质疑的,尤其是在我第四页引用的 Michael Meyer 的著作,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柯伟林教授指导的。根据台湾学者的成果和尚未公开的新成果,他强调这里有一定的非延续性,而且有许多其他发现。我想把这些东西总结一下。我还有多长时间?好的,十分钟。

很多人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的重点建设项目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助的 156 个优先重点建设项目是全新的。我自己在关于人事问题的研究中也发现,民国时期国家资源委员会的规划者在 1951 年、1952 年事实上已经被推到一边了——我呆会儿再讲他们——党的核心组织,党组,事实上接管了大部分新成立的政府机关的领导权。所以,如果我们要强调 1949 年前后的延续性,最大的困境

在于 1949 年后的新开端其实并不是开放式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涉及到这里的大多数论文。这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控制和权力的问题,也是在唤起暴力革命时的意识形态问题。所以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对 1949 年的共产党规划者来说,并不存在中立的、开放的政策选择,从陈云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是过渡时期,显然与权力有关。我引用了李华钰关于 1953 年后所谓经济斯大林化(economic Stalinization)的新研究,她描述了毛泽东在思考经济问题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时,和斯大林的概念有多么接近。这是一项强调转折(1953 年的决定性转折)的相当重要的研究。

但是我也在最近的文献和资料中发现了有趣的东西,即中共根据地和战时经济的遗产。对此确实有争论,尤其是日本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试图梳理从 1949 年前到 1950 年代的战时经济心态,并从物理单位的角度来探讨计划问题。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制定计划者不是用货币单位,而是用物理单位(如吨和其他重量单位)作为制定计划的标准。

另一项显然来自根据地和战时经济的遗产,是我们所说的游击战式的政策风格(guerrilla policy style),Perry 教授和我在《毛泽东的无形之手》(Mao's Invisible Hand)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概念。这种风格在计划体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它总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有趣的是,这种风格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出台的第一份文件中就已经存在了,他们其实已经有了许多纠错机制来对计划进行调整,使之更加灵活,这和苏联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从一开始他们就采用了相对灵活的方式,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大量的纠错机制、调节机制被引入计划体制。在我看来,更有价值的研究其实是由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管理有一个 M 型模式,和苏联的 U 型管理模式相对。苏联 U 型管理模式意味着劳动力的等级制分工和严格的功能专业化,中国的 M 型模式则意味着各个分散的单位都包含了其他单位所具备的各种功能。所以我认为那些战时经济和根据地经济的经验确实很重要,它们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从现在的计划体制开始,首先界定它的鲜明特

色,然后向前追溯到 1940、1950 年代,这就是我采用的研究路径。这些特色有许多可以追溯到战时经济的经验。

我还要强调另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从 1990 年代或 1980 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苏联的作用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研究中被低估了。我从苏联解体后的档案研究中了解到(这是另一件有趣的事情),1990 年后的学者们是如何研究苏联计划体制的,他们从令人震惊的档案中得到了什么。这种经济完全是混乱的、变动的、即兴的。它既不是(经常出现在漫画中的)苏联斯大林式的、集权式的僵硬体制,也不是中国毛泽东式的、分权式的波动状态。这是某种漫画式的东西,从我在档案中读到的苏联解体后的内容来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混乱、变动、有弹性的。所以,M 型模式、U 型模式之间的差异也许并不像文献中描述的那么显著。

第三个命题来自那些非常聪明的党史学家。例如武力教授就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历史学者,他尝试描述中国的决策者们如何试图从早期就有所作为,试图从一开始就对苏联计划体制加以修正,并试图根据中国的需要和环境去调整、而不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方法。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路径,也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除了这里指出的细节之外,还有一些高层领导人,例如陈云和周恩来,曾经做过一些其实很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有一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例如在 1950 年代,他们对苏联计划体制的数学模型不太满意,所以没有接受它——这些模型过于关注细节,并考虑了一些错误的变量。事实上,他们的做法是通过联合国的非正式渠道,邀请印度的统计学家和规划人员到中国来提供建议,探讨适合发展中国家——而不是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型。这是一种秘密行为,他们没有告诉苏联规划者就采用了某些印度规划模型。所以这里的第三个命题就是,1940 乃至 1930 年代的中国经验,影响了中国引进苏联模式的方式。

这里有很明显的证据,但与此同时,我也再次发现了相似之处。我们当然时常会看到毛泽东式的易变性,他对计划体系造成了破坏。我在北京很多原高层规划者的家中和他们交谈时,他们总会抱怨毛泽东,认为他的折腾政策事实上破坏了

规划,破坏了他们心目中完美的计划体系。他们谈到这一点时很放得开,对毛泽东有很多批评。但令人惊讶的是,根据我们从苏联资料中看到的情形,斯大林几乎用同样的语言来形容他是如何地不喜欢规划者,如何地不相信规划者,如何地把他们视为革命精神的阻碍力量。他们各自独立地使用了几乎同样的字眼。所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相似性再次变得很显著。经济上的不满打断政策制定过程,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像“抓住纲领”这样的术语最初来自列宁,斯大林也使用过,但人们通常会说它是毛泽东的独创。许多顶层干预的方式,我们也在苏联体制中发现了。

所以我的结论,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一定不能把 1950 年代的计划看作一个单纯的技术官僚运动,因为它的确是共产主义消除独立经济力量的一种方式,通过计划消除独立经济力量,是他们引入计划经济的主要原动力。尽管有着不同的逻辑,但我认为它和我们在苏联看到的源头是密切相关的,计划是一种政治控制的手段。它也和经济效益无关,这一点令我很震惊,许多探讨计划体系的经济学家强调它明显缺乏效率。然而,效率并不是经济规划者的目的,事实上它是关于政治控制、关于集中控制资源的,经济效益并没有被认真地提出过。这一点(缺乏效率)最终破坏、摧毁了计划体系,这是体系崩溃的原因,而不是体系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到苏联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被很好地记录下来。例如沈志华提到当时陈云和苏联代表团每周举行会议,有意思的是,苏联顾问其实也建议中国不要和苏联经验靠得太近,一些苏联顾问对中国只接受苏联计划方法是相当怀疑的。所以这里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

如我文中所说,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为什么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都低估了苏联的影响呢?我认为其间的差异和原因都是很明显的。中国方面尤其是党史学家方面明确强调从新中国初期就采取的独立路线,试图和苏联传统拉开距离,但我的看法是,至少 1950 年代的大部分规划者是紧密追随或模仿苏联模式去制定详细计划的。对西方学者来说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有时也强调差异,强调中国采用的独特方法,但是我认为它也低估了计划的重要性。我们想当然认为计划没有用,所以不得不放弃它,这就是 80 年代以来的情况。

所以我仍然要强调中国计划体系出人意料的持久性,我们对此有过许多讨论,我有一篇研究了好些年的文章,今年夏天将和 Barry Naughton 的评论一道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上发表。事实上,我想要讨论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西方的研究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没有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对发展规划的改造,为什么以及哪一种特征被西方的研究完全误解了?这种改造仍然是一种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的雄心壮志,它仍然在那里,仍然很重要,并已经在非常重要的政策领域重新注入活力。西方研究对计划体系延续性的忽略,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市场化范式(marketization paradigm)的优势地位,因为至少从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社会科学看来任何被视为计划的东西都会不可避免地消亡,必然由计划转向市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传统社会科学模型,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国家指导、混合计划、宏观调控(一个非常重要并被政府再次强调的术语),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才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央银行真正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宏观调控者手中拥有比西方货币和财政政策更多的工具。所以,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中国家干预机制的脉络有一个更深入和全新的理解,我认为是时候超越过去二十年间关于转型和融合之争的认知偏见或虚假信心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国家干预的问题。我在这个工作坊中发现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是来自社会科学视角的方法论建议。如果要认真对待1949年分水岭并试图跨越它(这其实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我想我们必须区分以下两种关系,一方面是我称之为软类比(soft analogies)或类似的东西,一方面是与之相对的硬联系(hard linkages),即因果联系(causal linkages)。这确实是一种挑战。要说1990年代有政府主导的公司,光有软类比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可以在时间上进行追溯的方法和工具,也需要建立这些硬联系的术语。就我的研究而言,就是要有直接模仿苏联程序或者国家资源委员会程序的术语和方法。国家干预经济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控制私营经济、控制价格,还是为了其他较小的目标,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对所有跨越1949分水岭的研究来说,显然还需要确定其国际背景,如内战、阶级斗争、朝鲜战

争等。对今天的政治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权威关系,如果我们想找到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在现实中的运作、层级协调的模式之类的硬联系,关注具体的权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真正想说的是——这是来自社会科学的具有刺激性的观点——我们不能仅靠软类比建立延续性,我们必须找到硬联系去探寻这些具体的过程、术语、方法、权威关系。要认真对待并跨越1949年分水岭,这一点也许是很有帮助的。谢谢大家!

柯丽莎(Elisabeth Koll, 哈佛大学):让技术和管理适应政治目标:1930—60年代中国铁路行政的转型

我很抱歉来晚了。首先我要感谢李教授组织这个工作坊并邀请我参加。我要讨论的是中国铁路行政及其运作形式的历史演变。如果把1911年、1949年、1978年作为三个时间界标,实际上我的论文主要讨论的还是在1911年到1949年之间,大家会看到,我也讨论了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铁路行政的调整,它在战后时期继续存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在某些意义上,我的出发点是1978年甚至是今天,因为铁路行政仍然是中国一个主要的行政和经济结构,尽管铁道部从今年3月10日起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铁路网络经历了巨大的扩张,铁路仍然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它雇佣了150万员工,对于我这样的历史学者来说,非常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是,它仍在使用1910年代就已出现的“铁路局”系统。所以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观察不同时期作为一种行政和经济系统的铁路的发展,去探讨我们有什么样的变迁,什么样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

我想说,从1912年以前的遗产来看,了解如下事实非常重要:中国铁路是从中外联合创建的第一个混合管理的铁路公司开始的,其中可以看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的管理形式和技术标准,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分散的铁路系统,每一段铁路有不同的标准,在组织和设备方面都有具体的影响。铁路系统的存续和发展可以回溯到1920年代孙中山设计的那些宏大计划,但铁路系统的扩张确实花费了很长时间。这是1905年的一张图,图中所有虚线都是刚规划的铁路,它们当时并不存在。1912年后中国铁路公司及其行政机构

的重组,使我们第一次拥有国际化的铁路,并开始在政府层次进行集中化管理。我们建立了专门的管理部门,当时叫交通部,我在文中描述了其行政结构的漫长变化过程。

我们再来看看铁路局系统的建立。至关重要的一项是,它试图赋予基本上作为各铁路线总部的铁路局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因为他们必须确保各条线路的运行,担负维护之责,并将各条线路整合成替代性的交通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把各铁路局整合成一个中央行政机构,但这证明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直到 1930 年代仍然缺乏足够的会计师和统计学家,如何把一个极其复杂的行政机构置于集中控制之下,其间有大量的尝试、错误和实验。

1927 年以后发生了更大的整合,首先是 1928 年铁道部的实际建立。如果了解民国时期铁路局是如何组织的,大家会看到,就其历史联系而言,政府主导的行政转型是以非常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现在它更专注于经营,更倾向于功能性,并赋予铁路沿线机构以更大的自主权。例如,我发现了一件很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 1949 年前的中国铁路基本上是由站长负责的,各主要站点在分配货运车皮、进入特定仓库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民国时期,尤其是 1927 年以后,铁路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战,再加上世界大战的干扰,是这些铁路局的自主权何以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因为铁路局要负责修复各种损坏,负责疏通受到军事攻击的铁路段。这一点并不新鲜,大家都知道,在 1920 年代的民国时期,铁路的效率和营业收入受到内战的强烈影响。

我在文中对日据期间的情况作了重点阐述。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铁路,主要是因为游击队的活动——山东铁道游击队,对此有过长期的讨论。铁路在抵抗运动和全球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的论文讨论的主要是铁路上的员工和铁路的社会经济功能,日本人对维持这些铁路机构的运行非常热衷,因为它们对战争结果至关重要,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通过我做的口述史访谈——日本人把铁路工人(我们这里说的是熟练工人)拴在铁路局和维修车间,给他们提供相对不太糟糕的工作条件,只

是试图笼络他们,以免失去宝贵的人才。同时我们还看到许多高层的车间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大部分是国民党工人)进入内地,迁移到自由中国,为自由中国的铁路系统工作,1945 年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接下来我讨论了战争期间铁路作为经济金融、物流配送以及难民的生命线的关键性作用。这是在撤退期间,在一个非常悲哀的时期,铁路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交通工具在通往港口、逃避战乱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管理功能方面,铁路局成了非常受人尊重的机构,因为他们出于政治原因而试图维持铁路网的运行——1927 年之后铁路局在行政管理上完全是由国民党主导的——但在运行中也有职业荣誉感的因素。铁路网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机构。

这张图显示的是 1949 年铁路网的模样。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网络,这里有大量断开的、零散的、未完成的铁路,它还向东部地区严重倾斜。说到 1949 年后的争论,我认为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如此迅速地接管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确实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我认为建立铁道兵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它把铁路建设变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士兵服从的是军队的而不是铁道部的权威。铁道部当然会配合军队,但这意味着一支有纪律、有奉献精神、有忠诚感的队伍,以前很难克服的困难可以基本上交给军队去解决。而且我必须强调,在民国时期铁路轨道几乎没有任何扩张,要拓展铁路系统绝对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同时,既然铁路作为一种工具卷入了战争,它当然具有特定的意义、象征和政治功能;而在 1949 年之后,铁路所具有的准时性、纪律性等现代或西方的价值,现在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而管理好铁路。1949 年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重建,不仅是因为大部分铁路网络遭到了破坏,也是为了根据详尽的计划进一步扩张。按照 Sebastian 的说法,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扩张并不是由效率或市场机制,而是由政治议程所驱动的。所以在 50 年代(铁路延伸到)新疆是由于核试验基地,到云南等南部地区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到北部地区则当然是因为朝鲜战争。

除了铁路的扩张,我们还要考察设备的生产。

到 1945 年大约 80% 的设备是进口的,对于生产机车和铁路设备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1950 年代有一些苏联工程师在帮助中国,但我要说,苏联铁路模式对中国铁路管理结构并未产生主要影响。

这里有一些铁道兵工作的照片,他们像极了铁路沿线的驻守部队。这是我在文中谈到的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铁道兵使我们有了一支文艺部队,可以把重点放到整合当地文化、让人们熟悉党的使命上面来。当然,从宣传、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把铁路建到边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把边疆民众、少数民族和中央政府更好地整合起来。在儿童书籍和电影里面,铁路当然也是一种宣传工具。如果大家有空闲时间,我强烈推荐一部 1965 年的电影《特快列车》,它提到了做一个好列车员和一个好党员的方方面面。有许多这样的电影,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把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老式的铁路价值观结合起来了。

最后我想说,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主旨也就是方法论而言,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弱国家的强机构,还是一个强国家的强机构?我认为答案并不是那么清晰,因为 1949 年以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可是在中央机构即铁道部与铁路局系统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这个系统现在仍然存在,拥有 18 个铁路局,只比战前少 3 个。当然现在大家知道,这些铁路线上都有党的机构,但可以肯定,这个系统的存在仍是贪污腐败严重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在货物供应和分销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就历史遗留和路径依赖而言,我认为这是调整系统以适应政治形势、也是通过旧系统引入新事物的一个范例。我还想强调,铁路的扩张和国家力量的延伸,对乡村和城市地区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东部沿线的城市地区已经实现了很好的整合,这一点对西部边陲地区来说尤其重要。我就说到这里吧。

萨克斯顿(Ralph Thaxton, 布兰代斯大学):  
从非法社会主义到非法“资本主义”:中国建筑业农民工抗争的起源

我今天想要讨论的,是 1958 年至 1961 年社会主义大跃进与后来资本主义大跃进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相似性,特别要关注我们正在研究

的建筑业农民工亚群体。我们掌握的资料还很有限。我们在研究区域选择了 10 个村庄,目前已对来自河南北部一个村庄的 33 人作了深度访谈。我希望向大家展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揭示这些人在当前体制下的生存状况以及政治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我认为,他们许多人把改革视为把自己从毛时代残酷而屈辱的劳动制度中拯救出来的契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很欢迎移民的机会。许多人很高兴现在有迁移到食物充足之地的自由,可以离开或逃离村庄而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他们加入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国内移民大潮。不过,我对这场移民潮将要提出和主流政治学、经济学不太一样的看法。另外,这些人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建筑业农民工有许多联系,我想要探讨这些联系的推动因素。我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考察不能完全吻合,不过我读到的最近一些文献,包括 Sarah Schlueter 在威斯康辛的论文,至少在微观层面支持了我的这项研究。

我研究的这些人很少拥有所在城市的居留权,他们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正是这些非法的农民工建造了北京机场和许多其他机场,建造了把我们和先前提到的交通线连接起来的火车站台,建造了高速公路、五星级酒店、百货商场、高层公寓、发电厂等等。这个村子现在大约有 3000 人,他们许多人加入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大军,其中绝大多数在建筑行业。有趣的是,全国大约 71% 的建筑业农民工介于 15 岁到 29 岁之间,但这个村庄该年龄段的劳动力只占一半,另一半则在 30 到 63 岁之间。在我们深度访谈的 33 人中,平均年龄约为 47 岁,如果去掉最年轻的两人(分别为 17 岁和 21 岁),平均年龄会上升到 50 岁。事实上,该群体中不少人的年龄在 55 岁到 57 岁之间,其中许多人已经在建筑行业工作了 20 到 25 年,有几个甚至从 1960 年代就已经从事这个行当了。

如我所说,他们许多人很乐意逃离毛时代强加给他们的制度化奴役状态,不过,他们对迁移过程的记忆与官方叙述并不一致,尽管后者承认政府的确使贫困的村民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国家发展计划的储备劳动力。事实上,考虑到城乡分割问题,这些农民工是备受歧视的,他们背井离乡、

谋求生存的尝试曾被当作罪行。在邓小平时期，我们发现政府使许多农民（这里指贫困的农民）变成了游民，并或多或少使他们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研究的这些农民工，许多人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困扰，这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大跃进期间那种国家主导的疯狂行为，这正是我今天要阐述的要点。

毫无疑问，在改革初期成为农民工的那些人，有许多是想继续当农民的，但他们遇到了很多方面的障碍。例如，对这些人来说想要得到任何一种机械设备都很困难，因为当地的领导和干部在集体化到来时夺走了各种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用公共财产来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谋利，包括如今仍留在村里的为数极少的拖拉机。此外，这些农民工大多只有很少的资本对他们在改革中获得的土地进行投资，他们大部分人在大跃进中已经被剥夺了所有财产，从大跃进到 1980 年代改革初期，他们一直都很贫穷。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办法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所有这些都是被政府垄断的。而且事实上，在采访中所有人都告诉我们，他们出去打工的原因之一是农业没有回报。想一想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关于华北内地的著作，可以说这些年里中央政府削减了对农业的投入。所以导致的结果是，这个村庄的人们除了离开土地去寻找非农业收入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他们离开土地还有另一个推动因素，就是当地没有乡镇企业，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个的，可当地领导人把它给摧毁了。此外，政府也没有为这些贫困的年轻农民提供任何技能培训。

这些人不得不开始小偷小摸，盗窃他们最迫切需要的一种东西，好让贫瘠的土地能够满足自己家庭的消费需求，这就是化肥。改革初期，在农村地区出现过围绕化肥的大规模斗争。要记住，这种东西是被政府垄断的。我没有时间详细阐述这个问题，他们开展斗争的方式之一是在夜里截停政府的卡车，把化肥一袋一袋从车上卸下来。这成了一个大问题，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公安人员，让他们穿便衣伪装成卡车司机，最后能查明大多数抢劫是哪个村庄干的。所以许多人因为偷窃国家垄断商品而被逮捕和监禁。这场地方层级反对偷盗国家垄断商品的运动是和 1983—1987 年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大批

的村民被监禁并被不成比例地判决为盗窃罪，这让他们在村里感到极大的恐惧，觉得和呆在当地偷窃化肥、与公安发生冲突、最后被投入监狱甚至更糟糕地被处决相比，迁移外地的风险要小得多。

当他们前往他处谋求新的生计时，许多人在工作、生活方面遭遇到了和集体化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期间）非常相似的不公正待遇。劳动力流动使村里的农民被推到和政府有联系的承包商那里，这些人把国家推行的改革视为利用建筑业农民工去谋求私利的机会，经常强加一些和毛时代大队和公社体制相似的高强度、屈辱性的工作和生活条款。主要问题是他们经常得不到劳动报酬。农民工工资本来就很低，还经常被拖欠。如果回过头去考察一下大跃进的情况，我们会看到在大跃进高潮时期，党的领导人会许诺高工资以吸引农民去村外的工地和营地干活，有时工资能达到留在村里为大队干活收入的三倍。可他们总是言而无信，甚至拖欠农民赖以糊口的工资。这不仅仅发生在我现在研究的河南省，而是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我已开始考察的安徽许多地方。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在改革时期再次出现，我们在采访中也看到这种情况。建筑业农民工告诉我们，拖欠工资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政府对包工头与警察之间的勾结视而不见。他们还告诉我们，承包商在很多情况下（当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是些控制着犯罪团伙的人。另一个事实是，承包商提供的往往是尽可能最便宜、因而难以下咽的食物，他们说甚至比自己在农村老家喂给猪吃的还要差。这个村叫大佛村，是我最近一本书所研究的地方，村里许多农民工都是过度劳累、身心疲惫的可怜的受害者，这也正是他们的前辈在大跃进期间所遇到的情况，是大跃进期间工作和生活的缩影。说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延续性，工作时间的安排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在大跃进期间，各地的人们都要每天工作 13 到 20 个小时，连续工作 7 到 10 天，经常没有或只有极少的休息时间。在改革时期出现的则是这种做法的稍微温和一点的版本。

此外，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也重新出现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农村的学术文献都认为，中国市场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原因在于比毛时代有更多的劳动力流动。我认为这个假设在我

们对农民工做的一些访谈中的确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他们许多人又告诉我们,城里的包工头设置了重重障碍,不让他们自由离开工作的地方。他们说,承包商特别是分包商剥夺了他们离开建筑工地的权利,而他们在这里遭到了难以忍受的剥削。我没有时间详谈这些人是怎样限制他们的,我想强调的是,农民工想要离开这些工地,不仅是因为得不到原来承诺的工资,也是因为这里的工作非常危险,许多人成为致命事故的受害者。这些工地又是一个没有医生的世界,也就是说,一旦在这里受了伤就会遇到大麻烦。不仅如此,人们还会面临日常的健康问题。工地上的伙食供应制度太糟糕,大部分工人只能吃最便宜的食物,很少吃到富有维生素的蔬菜,这种剥夺削弱了他们的免疫系统,增加了他们死于意外疾病的风险(这也是导致许多人在大跃进期间死亡的模式),也使他们更容易遭受环境污染、席卷潮湿寒冷的工地的致命流感以及蚊虫滋生疾病的打击。更不用提那里实际上没有任何紧急医疗设施。

所以人们可以想象这些工地上对意外死亡的巨大恐惧,也可以想象它和过去大跃进时期的联系。对此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些来到城市特别是北京、天津等华北城市的农民工常常怀有巨大的恐惧,害怕自己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死在遥远的工地上。如果有两起或更多的死亡记录,许多建筑公司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所以未记录下来的工伤死亡事故恐怕不在少数。死亡工人尸体失踪的谣言在工地上传播,人们就更加害怕远离家乡、孤苦无依地死去,害怕死后不能回家、不能得到传统的葬礼。

现在我想简单地讨论一下抗争策略和工具的问题,我会非常简单,在讨论环节我们可以谈得详细一点。我要谈到的反抗策略都是集中在拖欠工资的问题上,而不打算探讨农民工针对其他问题或议题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一种相当巧妙的策略。我们从一些访谈中了解到,有些工地经常会发生工具失踪的事情,农民工偷偷拿走机械工具,使建筑工程限于瘫痪,然后他们会在关于工资的激烈对谈中以某种形式暗示包工头,只有把工资付给他们,才能在工地上找到这些工具。这里发生的情形,其实是一种隐蔽形式的罢工。

第二种抗争方式是盯梢,这是一种非常有趣

的抗争方式。有些有勇气、有胆识、有新意的农民工说,他们会弄清楚包工头哪天去拿应该付给大家的钱,比如总共2000人、每人500元的一笔钱。某个农民工紧跟在包工头周围,一旦看见他拿到给工人的钱,就会跑到他办公室或者家里,说自己要马上拿到全部工资,或者大声喊叫,告诉其他工人钱已经到了。他们经常采用的这种做法,当然使包工头没法携款逃跑,在不少情况下证明是相当有效的。

另一种抗争形式是静坐。我们从蒂利(Charles Tilly)关于法国抗争的著作中了解到,1850年前民众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就是到那些欺压穷人的住处聚众示威。我们发现这种情形相当普遍。人们会跟踪包工头从城市回到乡镇和村庄,两人、四人、六人、有时十人一组地在那里静坐,拿不到工资就不离开。有趣的是,许多这样的静坐故意选择在春节前后进行,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告诉包工头,“好吧,我们就呆在这里帮你们准备过年,你们要吃饺子,我们给你们帮忙。”这时,包工头往往会拿出平时他们说没有的钱。

最后,我们还会看到因工资不公而引起的争吵和打斗,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是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开始学习武术,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学习和使用这些技能,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进入了建筑业这个狗咬狗的世界。

我还想谈一谈分包商、裙带资本主义和过去的遗产。在改革初期,许多承包商是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和优势地位去成立建筑公司的共产党官员,这反过来又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地区形成垄断的建筑行业,并把市场网络延伸到农村地区和县以下层级。分包商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他们有时仅仅是这些与国家有联系的强大行动者的代理人。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坦率地说我对此了解并不充分——分包商及其政治恩主的极度贪婪,并不纯粹是改革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党的工作作风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毛时代的灾难给国营建筑公司带来的危机,大跃进饥荒使国家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留下许多没有资金的公司,并鼓励管理者从事各种欺诈行为。最常见的骗局是宣传没有资金的项目,提供没有抵押品支撑的合同。一些上了年纪、在大跃进时大约十来岁的建筑工人,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一位农民工在大

跃进中幸存下来时大约 10 岁或 12 岁,后来 18、19 岁时开始在天津当建筑工人,他说,建筑分包商就是那个承诺付给工资并和他呆在一起、可最后总是要克扣和拖欠的人。所以,拖欠工资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跃进时期的危机。

我的时间快到了,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会两分钟内结束——如果可以的话。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这个村庄或这个地区的农民工很少有人相信政府而去信访或请愿。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要求会得到迅速或高效的解决,所以他们远离这些做法。

让我来一个没有充分依据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大跃进,向大家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作为我发言的结尾:为什么建筑业农民工会如此暴躁,并且在我看来构成了对体制的威胁?这不仅是因为怀默霆(Martin Whyte)所说的等级制度或阶级隔离,而且他们加入保护性工会组织或者拥有话语空间的可能性比南非还要低。在我看来,这些依附性劳动力时常面临变成居无定所者的恐惧,他们在建筑行业的经历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恐惧。所以,为什么北京的统治者会担心这些人给自己制造麻烦,破坏 Kirby 教授在屏幕上展示的巨大发展成就呢?从许多方面来看,抗争力量和潜在的抗争力量在 1989 年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不再以任何大规模的方式进行抗争。这些建筑工人建造了机场,建造了公安总部,他们知道那些歧视、虐待自己的政府官员和暴发户住在哪里。但这些带着实实在在的愤怒情绪的人,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会和其他群体联手。城乡分割使这些人和其他社会群体相分离,政府也不希望他们和其他社会群体联合起来。

最后我想说,这些人越来越多地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当我开始研究建筑业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许多学者都倾向于低估它的重要性,仅仅通过和村里人交谈的方式去研究它,好像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建筑工地附近或仅仅发生在城里。但事实上有一个中间地带,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带,在那里,人们磨炼针对建筑业不公现象的抵抗艺术已经有几十年了。

谢谢大家!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评价的尺度:1949 年后的中国大陆进步了吗?

我这篇文章看题目大家都会认为太大,为什

么太大呢?我想我是被里峰给“坑”了。因为他起草了一个很好的提纲,里面列了一些非常大的问题,说要跨学科,要讨论方法,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提出如何跨越 1949 年这条分界线。正好最近几年我也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写这篇文章,虽然最后还是没有写完,但我确实想和大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要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其实我的一个最大困惑就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一直在研究历史,讲了很多历史的故事,是为了什么?我们想让别人知道什么?包括我们培养了很多学生,他们花了几年时间,学会了把档案、数据收集起来,最后变成一篇历史论文,然后把论文交出来毕业,这几年的学习我们让他们懂得了什么?他们每个人都考察研究了一个历史片断,就他们做的每一个小事件、小个案来讲,多半也都意思,但是单独看这些一个个案研究,意义又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把过去的这些历史碎片呈现出来呢?

从历史学理论的角度,人们对于后来人为什么需要记录和研究过去的人和事,阐述了很多理由。尽管这样的讨论今天看起来观点各异,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我认为大家的认识大同小异。那就是,人是思维的动物,人和人相互之间存在差异,人总想弄清楚自己是谁,无论是一家、一群,还是一族、一国,为什么有现在,过去如何来,将来何处去,等等。但也正是因为人从来就是结群生活的,从最初的氏族部落,一直到今天的民族国家,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不仅不同时代条件下,就是同一时代、同一群体中,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一样会存在很多不同。而时代愈前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异和分化反而愈加扩大或变得更复杂化。比如同是中国人,晚清时大家对此还比较容易取得共识,20 世纪以后就逐渐分化,你一派、我一派、他一派,甚至于弄成你一国、我一国、他一国了。站在不同的党派及其观念的立场上,大家对什么样的中国才是自己认同的中国,看法及情感也变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一种可以跨越 1949,或大家都能认同的历史认识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古哲人有云:“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

去。”人类思想家早就从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发现可以借助时间的直线进化的性质,通过前后对比,来观察和评判历史。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只因为单线进化的看法受到挑战,多线进化论流行,人们于是就开始否认人类历史中存在带有普遍性的相同的或具有规律性的现象。连诸如“现代”、“进步”、“文明”等观念,都不再具有价值判断的含义了。

仅就“文明”一词而言,今天这一概念的使用就非常混乱。但无论今天大家如何把“文明”文化化,找出多少种所谓“文明”来,所有后发国家衡量现代、进步的标准,多半仍旧使用的是三四百年前欧洲人使用过的那种强调开化的“文明”观念。因此,坦率地说,我个人还是比较赞同要从人类大历史的视角看问题,包括应该借用摩尔根等人把历史分成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其进化程度,而非片面强调不同民族或群体的差异性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历史。

摩尔根所谓的“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现代发展阶段,只不过作为生物学家,他更强调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成长过程。因此他所谓人类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即是从蒙昧,到野蛮,然后到文明的划分法可能需要有所检讨。我不反对把远古人类形成的历史阶段视为蒙昧期,但我相信历史学家更关心的是自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多数研究者今天是把文字的发明,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初步,但我更愿意把结群而居的不同人群之间交往方式的根本改变当成判断人类野蛮期与文明期的分水岭。从这一角度看问题,文字发明以后人类社会不同部落、民族、国家之间接触、交往方式,很长时期和原始人类之间的接触、交往方式,没有多大的改变,主要还是靠野蛮的、战争的方法。人类真正开始比较普遍地用人性、人道和人权的观念来看待相互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只是工业化社会形成以后才逐渐开始的事。因此,我更倾向于把人类文明史看作是一种建立在人的人性、人道、人权观念形成、发展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政治渐趋成熟的过程。当然,这不是我在这里可以说清楚的问题,我只希望由此给自己提供一个可以往下展开我的文章观点的话题。

因为文章没有写完,昨天在飞机上我还在想

今天怎么才能把这个话题讲清楚。我考虑的结果是干脆从结论讲起,倒过来,只讲一个结论部分。简单地说,我们现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很多很多说法。比如有摩尔根从生物学角度提出的三段论。还有从人类学角度把人类发展阶段分为古猿阶段、智人阶段、现代人阶段之类。还有西方历史研究中比较流行的年鉴派的说法: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比如:原始群时期、血缘家族时期、氏族社会时期、军事民主制时期、阶级社会时期等。当然,上个世纪以来,还有新进化论的说法,即社会进化非必然、非直线、异步、非竞争、无目的,没有什么进步和不进步,也即无所谓发展阶段的问题之类。

对于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在我的文章里也做了一些讨论。我个人基本上赞同进化论的观点或视角,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从总体上看是在进化的过程中,这种进化是含有进步的含意的。我们可以借用摩尔根的三段论,大致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但不是从生命成长的角度,而是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来做区分。比如,我们可以考虑把从猿到人过渡的原始状态视为蒙昧阶段;把群落生存条件下人与人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视为野蛮阶段;把人开始重视个体生命及个人权利,尝试学习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和平交往、和平共处,视为文明阶段。

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有没有这样一种以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保护为转移的一种历史进步呢?基于这样一种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历史阶段的认识,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看到我们今人在各方面都不仅远远不同于蒙昧时期,而且也大大不同于野蛮时期了。从长远的观点看,人权观念、人权状况、人与人关系状况,以及人们对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及其人的各种基本权利的尊重程度都在缓慢地,但坚实地改变着。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我们应该以人权状况作为衡量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基本标准的重要理由。

当然,我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或进步其实有两条线。一方面是物质的进化或进步;一方面是精神文化的进化或进步。物质进步指的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必然。简单

地说就是,人类社会不论在哪个角落,总是会经过石器时代、机械时代一步步缓慢地进化和发展。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不难从以工具的、技术的、科技的变化线索描绘出一种进化或进步的渐进的过程。同时,人类的任何一种生存方式或生存状态,都不免会受到这些物质条件的局限或影响。精神文化的进化或进步既区别于物质文化的进化或进步,同时也与之密切相关。没有工具的、技术的、科技的进化或进步,人类始终处在原始状态,也就无所谓权利意识的生成;人类部落始终维持一种狩猎或农耕的生产方式,人类各族群间不因工具(武器)的发达而扩张领土,相互发生交流和冲突,什么族群社会、城邦社会等等也不会生成,人与人之间严重不平等和权利地位严重分化的阶级关系也不会出现。没有这些压迫、掠夺、欺凌和剥削,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抗意识乃至平等诉求,集体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权利意识、权利观念和权利斗争也就难以出现,现代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性、人道、人权的进步意识也就无法产生出来,形成潮流,进而“改朝换代”。从历史进化的角度看问题,这种种苦难和血腥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那些只能靠集体狩猎、耕种和与其他群体拼杀才能维持生存的人群,个人的权利意识也无法生长出来。

我所以认为我们对历史的观察和评判需要具有这样一种历史进化观,根本上是因为不如此我们就无法超出一群、一族、一国的片面的价值观,无法真正跨越 1949 年这条线。因为我们眼界所限看到的只是历史的碎片或局部,只是我们自己怎么了,无法从人类历史的长程来判断我们自己的位置所在。我们局限在一群、一族、一国的眼界中,我们很容易忘了我者、他者其实都是人,只不过生活的地域不同、时代不同,因而族群、文化有所差异罢了。

其实仅以今天的民族国家而论,到 20 世纪上半期,世界上才不过 50 个国家,今天世界上已经分化成 210 个国家了。纵观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向,类似的分化还会持续。谁能知道再过 100 年、200 年,以群而分的人类又会分化成为怎样一种情况?在人类群体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历史研究者的眼界如果只局限在特定的人

群范围内,就很容易变成这一派、那一派、这一国、那一国的政治合法性的辩护者。过了多少年之后,这样的历史研究多半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那么,为什么应该以人权,而不能以生产力发展程度作为衡量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基本标准呢?一个基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也好,其他相关因素也好,都是由人来创造并为人服务的。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进化,固然是推动人类社会精神文化发展进化的基础条件,但是,一族一国生产力的发展进化并不必然推动本族本国精神文化的发展进化,甚至还可能给他族他国,甚至本族本国带来灾难。

为什么不能以民主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评价标准呢?亦或为什么不能以自由作为衡量标准呢?这里的关键是,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说建立了一个民主化的制度,或一个社会中某些公民有了较多自由,这个社会就进步了。一方面,民主或自由本身只是一种制度形式,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意义。比如民主本身也有好有坏,有多有少,并不是历史上所有民主制都是好的。何况,民主根本上其实是一个多数和少数的关系问题,它原本就不是以所有人为对象的。历史上一个国家侵略、掠夺、压榨另一个国家,与其自身民主自由与否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更进一步,民主与自由,相对于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权利问题。既如此,我们为什么要舍本逐末,去另定一个什么民主或自由的标准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历史研究者用来衡量或评价一个社会发展进化程度的标准,最简单的,或者说最直观的,就是它的普遍人权状况。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时代的发展阶段,我们如果要站在后来者的角度来做检讨或做评价的话,最重要的莫过于考察它的普遍人权状况。所以要衡量普遍人权状况,是因为任何整体主义的,包括集体主义的社会,总是有些人的人权状况好,有些人的人权状况差。只有从普遍人权状况的角度来考察,才能看出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整个人群人权观念的水平如何。如果那个时代、那个国家、那个社会中的人们对个人权利,不要说自由权、财产权,就连生命权都不尊重的话;或有尊重,却只尊重部分人的权利,不尊重另一部分人的权利,那么,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落后

性或局限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基于这样一种视角或标准,我们应该很容易看出以 1949 年划线的局限所在了。当然,如果我们相信文明本身是和人类现代历史进化程度紧密相关的话,我们恐怕也需要了解,现代文明的进程到今天为止才不过开始了几百年时间。相对于人类成百万年蒙昧时期,哪怕相对于人类数千年野蛮时期,我们身处的这段历史恐怕才仅仅是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或过渡时期。不仅基于人性、人道、人权观念来处理 and 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党派、族群、国家观念的牵制,甚至是排斥,野蛮的现象到处都有,而且在落后国家,这种观念转变起步都很难。但是,我个人相信,从历史长程的观点看问题,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人们一旦登上了现代文明前行的列车,从野蛮到文明的渐进,终究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评论人:柯伟林(哈佛大学)

真的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评论。但是首先我想要再次感谢李教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重新审视一个确实需要审视的问题。要重新审视如何划分时间阶段并思考相关问题,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我们不得不以某种分类的方式去理解过去——可以是总统任期,可以是王朝循环,可以是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认为关于 1949 年分水岭问题的这种讨论——尽管不是每篇论文都在直接探讨它——如果想一想 25 年或更久以前类似的辩论,我们确实置身于一个相当不同的场景中。我记得当我还在研究生院读书时,人们的确有一个关于旧中国和新中国的观念,你知道的,新中国,一切都是新的。费正清在课堂上会把中华民国讲成一个后继乏人的失败者,他在《美国与中国》的每一个版本里都会把人民共和国写成清王朝顺理成章的继承者。一些台湾学者很重视这种历史编纂学,因为它对 1912 到 1949 年中国第一个共和国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作了高度政治化的描述。

我想从某些方面来看,它的确值得重新审视。当然没有人(肯定更不是我)会否定 1949 年革命是一个改变了许多许多事情——包括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包括付出数千万人生命的代价——的极端重要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思考随着时间推移哪

些发生了变化、哪些没有变时,我认为 Sebastian 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文献综述。我还愿意向大家推荐 Michael Meyer 的这部著作,两大卷德文著作,我想 Elisabeth 和其他很多人都读过,它的英文版很贵,但的确很不错。大家知道,实际上我赞同 Sebastian 在这里的几乎每一个结论,我只想很宽泛地指出,我们需要辨别出目标上的广泛延续性,然后寻找人事上的延续性,最后再探讨政治组织及其运作的不同方面。

我仍然相信,国民党战时经济对 1949 年以后的影响要比共产党战时经济更为深远,后者相比之下主要局限于农村地区。无论如何,中国有两种战时经济,如果算上日本占领区的话实际上会更多。我还相信,为了国防目的而全面动员国家资源的观念,是理解斯大林模式下进行集体化、公社化的经济目标的另一种途径。大家知道,国民党也正是这么干的。像 Elisabeth 在她文章开头指出的,到 1949 年,国家拥有 97% 的钢、60% 的煤,并完全控制了铁路。国民党不是平白无故被称为国民党的,他们的确相信这一点。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导致了远为极端的后果。

你可以说 1956 年是比 1949 年更重要的年份,因为它的确使中国的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中断了至少 20 年。贫穷的鲁冠球没有别的办法,他必须把私有企业伪装成社队企业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乡镇企业正是作为社队企业开始起步的。因为人们其实记得谁的父母曾经是企业家,农民也记得谁曾经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段时期非常短暂,我们可以回溯到 1949 年后的经济合作形式,1978 年之后不久许多地方发生的也是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改革时期的国有企业显然不是五六十年代国有企业形式的回归,事实上,大家知道,1980 年代关于合资企业的法规其实是 1940 年代末国民政府法规的复制品。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场很猛烈的运动,非常接近于国民政府所说的国有企业法人化(并非私有化)运动。国有企业早已大量采用的法人形式,民营企业直到最近 10 至 15 年才开始采用。

我认为 Michael Meyer 的著作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说如果不把台湾的情况考虑进来,就没法真正讨论 1949 以来的延续和变迁的问题。1945 年、1946 年、1949 年,国民党在台湾干了什

么？他们在 1950 年代干了什么？战争时期如此强烈的国家主义趋势的戏剧性延续，直到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进口替代型经济出现时才告结束。他们由于历史的偶然不再拥有大陆市场。台湾的经济比大陆恢复得更早，工业人才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在 50 年代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1949 年有许多技术人员留在大陆，他们不一定喜欢蒋介石或者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可以得到生存和发展。当然，到 1953 年，大多数过去的技术官僚显然无法向上升迁，可他们毕竟留下来了，担任主要企业的首席工程师等职务，直到 1958 年才跌入深渊。在台湾的那些人可以升到很高的位置，去了美国的人则发展得更好，有些人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例如我们的好朋友王安——他在我们这里设立了王安奖学金。但是看看留在大陆者的人生轨迹，他们在 1958 年之前为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1978 年之后又通过自己的学生（或者可以称为学徒）继续做贡献，可是和他们可能取得的成就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我认为苏联的作用总是被低估了，不仅对共产党如此，对国民党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只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中思考问题，中国是这个时代全球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代皆然。所以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它对 20 世纪前期每一个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三年、四年、五年计划，对美国的新政，对国民党的三年四年计划和所有企业都有影响。苏联模式几乎随处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性的标志。

有趣的是，1950 年代苏联工程师们来到中国时，发现他们的中国同行受过良好的训练、良好的教育，有些是战前在德国接受教育，更多的人则是战时在美国接受教育。这些人在国际上处于很高的水平。但不管怎样，我总是会强调苏联的影响，我说，“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苏联，就没有新中国。”大家可以在 1924 年的国民党那里发现同样的情况。苏联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但它又去帮助国民党改组。它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直到今天当然也还存在。有多少其他国家在他们的中央委员会里设有政治局？无论如何，这不是中国历史上所独有的。我想说，Sebastian 对我认为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做了很好的评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杨奎松非同寻常的发言。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考虑到中国今天的地位，如果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么它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与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相关联。我个人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已经看到的进步，最近二、三十年——现在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惊人进步，如果不考虑 1949 年以前奠定的基础，是无法理解这种进步的。大家知道，孙中山相信一个国家的财富应该用铁路的长度来衡量，这样看来美国是极端富裕而中国是极端贫穷的，那么现在中国今天一定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地方了。孙中山有各种有趣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应该少用煤、多用电，尽管我不认为他在那时候真的明白电是从哪里来的。他并不总是处在科技前沿。

说到铁路，Elisabeth，如果想一想铁路是怎样经营的——你对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其实只有少数几种经营铁路的方式。各地的铁路都是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联合修建起来的。看看美国的铁路系统，在建造第一条美国铁路时有庞大的英国资本。有些地方的铁路会保留很长时间的民营形式，然后才变成公有。在欧洲大陆，铁路成为国营企业要早得多。它们几乎都有这种单位系统。如果去考察一下纺织工业的历史，从曼彻斯特到洛厄尔（Lowell）到马萨诸塞的劳伦斯（Lawrence），再到上海、无锡，然后到广东、香港，你会看到它们都有非常相似的组织结构。人们相互学习，中国纺织业的开创者们会去劳伦斯和洛厄尔的学校，从劳伦斯和洛厄尔进口原材料，同时也引进他们的单位系统。我曾经很不幸地体验过美国铁路的单位系统，呆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小镇上，住在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铁路旅馆里，那儿很不靠谱，得在吧台登记、付钱，而且只收现金。

我要问 Elisabeth 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铁路规划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是一个极其政治化的计划，他的经济知识也是非常政治化的。他的计划是和各省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后来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往后蒋介石的计划则是高度军事化的，不仅和各省资本家、而且和国防工业联系在一起。1920、1930 年代中国航空运输网络刚起步时，也是同样的情况。有一本很好的德文著作，谈到了当时的航空运输是如何高度而简单地政治化的，这不仅是运输货物的问题，飞

机上的乘客几乎全都是政治人物。我想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在1949年前国家控制的铁路系统中有国民党的组织吗?我想应该是有的,在国有企业中显然是有的。最后一个,他们有没有时区问题吗?[柯丽莎:整个中国是一个时区,但这个时区实在太大了,所以……]对,在美国出现不同的时区,部分原因就在于铁路。你必须弄清楚到芝加哥是几点,时间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时间的国家化和规范化的问题。

Ralph的文章,我觉得真的很吸引人。他并不是把1949年前后的两个时期连接起来,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放在一起讨论它,农民工问题不单是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问题,它是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上海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是由来自宁波、苏北和全国各地的移民构成的。晚清和民国时期,那些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城市里生活的移民可能非常贫穷、困苦,但总体上他们并不比别人的政治权利更少。当时也有户口制度,但它的施行方式和今天不太一样,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把我们所知道的1910、1920、1930年代的移民潮拿来做个比较,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座的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比我更在行。到40年代,有一本书以浙江为例探讨了战争引起的移民大潮,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有价值。还可以做个有意义的比较,就是徭役问题。大家知道,今天走出村庄的那些人并不是去服徭役的,和1949年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做法不一样。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事物。我想起来,上个周末我就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庆祝活动。大家是否记得一个著名的故事,毛主席会见正在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工人,问他们:“你们愿意加班吗?你们想要更多的工资吗?”如果付工资给他们,才真是奇迹。他们当然回答道:“不,毛主席,我们不想要工资。”但他们确实把人民大会堂建起来了,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它是一个壮观的建筑,一个宏伟的礼堂。这里当然是带有某种强制性的。

公平地说,看一看今天的共产党,再和大跃进时期或更早期的移民做个比较,如今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比任何前任都做得好的地方,就是通过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人们有能力离开自己的家乡。经济学家也会说,一个政府

能给穷人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修路,让他们有机会离开家乡、外出谋生,这在大跃进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当时有很多人非正常死亡。总而言之,我认为Ralph已经就人类悲剧的延续性为我们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这些悲剧有些是出于偶然,另一些则部分是由经济发展、部分是由国家造成的。

好了,再回到杨教授这里,好消息是他没有完成他的文章,而我也没有完成我的评论。但他问的这些根本性问题,确实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1949年以后有哪些进步?这是反思1949年分水岭的一种方式,他就如何衡量和判断进步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思考。作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进步。它仅仅是物质进步吗?它是由GDP来衡量的?它意味着的是国家GDP还是人均GDP?它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影响和声誉?它意味着软实力?应该用健康、教育或福利来衡量它?或者像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所说,毛时代的共同贫困比今天巨大的不平等更可取,这种看法是积极的吗?

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回顾一下中国在过去六十多年和过去一百多年的变化,我们当然会看到人们的生命更长、生活更好了。他们有更好的住所,他们吃各种不同的食物(有些食物跟过去比对身体健康很有害,但至少有更多可吃的了),他们喝包括红酒在内的不同的饮料,他们读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品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Elisabeth已经提到其中一些)更多地旅行,当然,毫无疑问,今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自由要比65年前多得多。

但问题是你如何衡量进步,杨教授,你从哪里来衡量进步?今天的中国显然比1949年好多了,但它是一直在进步吗?进步总是相对的。如果你从1949到1979年来衡量中国的进步,东亚其他地区都富裕起来了(除了朝鲜和越南),而中国停滞不前,只在国民经济总量上略有增长,而人均收入和营养等方面从1958到1978年都乏善可陈。停滞绝不是进步,尤其是当你所有的邻居,包括讨厌的国民党在内,都竞相跑到前面去的时候。

另一种提问方式就是这次会议的主题,1949年分水岭,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只是不会如此直接。我们曾在这里开过一个关于

辛亥革命的会议,哈佛的年轻中国学生在会上会问这类问题:革命真的有必要吗?但实际上他们谈论的不是 1911 年,而是 1949 年。所以问题其实是:1949 年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另一种提问方式)有必要吗?显然这个问题是反事实的,但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还是经济增长的能力来看,革命都不能说是必定如此的。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高度的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发展目标。但是中国的农业、市场体系、企业家精神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功也是很成问题的,治疗造成的后果往往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其次是军事,我前面已经提到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大国,本来随着 1945 年、1946 年日本的战败而有望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但在冷战期间由于一系列原因而未能实现。中国既被别国孤立又自我孤立,切断了首先是西方、然后是东方的联系,使自己置身于现代历史上最危险的境地,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或同时击溃。如果这是进步,如果这是毛时代的实力,我想说这只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中国国际地位的乱象。

最后我想问的是,在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结束之后,中共实现秩序和文明的承诺了吗?当然,要说 1949 年后在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是很困难的。甚至直到今天,记者们总说习近平上台是中国十年一次的领导层和平换届,但是别忘了,它仅仅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二次十年期的和平换届,如果想想薄熙来的情况,它甚至还是多少有些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就用对这件事的思考来结束自己的评论吧。薄熙来的例子告诉我们,今天的政权仍未克服中国历史上一些长期延续的问题。首先,薄是一个大家庭的后代,是开国元老的儿子,这样的大家庭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其次,薄是一个地方强人,他在重庆任职期间的权力和权威比当年刘湘还要大,在这个地区拥有绝对的权威。三是和军队的密切联系,军队是政权的骨架,袁世凯之后的历届大陆政权都是这样。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薄利用司法系统来对付他的敌人。最后是常见的腐败问题,他被指控亲自参与了腐败。

这里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将民国、共和国的承诺制度化,找到一些持久性的制度安排,使它可以像自己的帝国先辈那样长期延续下去。好了,我

就说到这里吧。

#### 自由讨论

裴宜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 Sebastian 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很赞赏对经济计划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但是最后我对你说的苏联的影响仍然不太清楚。一方面,我们应该给它比过去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似乎斯大林和毛泽东并非迥然不同,我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苏联的影响非常大,抑或双方都试图发展一种灵活性。你谈到印度的规划者,我认为这非常吸引人,但是我确实也没听出来他们到底怎么重要。你看到的那些差异,到底是部门上的还是时间上的?当 Elisabeth 报告她的论文时,从她的视角来看似乎很清楚,苏联在铁路方面对中国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你知道,我想人们会不会假设苏联在某些部门的影响大一些,而在另一些部门小一些,所以中国人会审慎看待苏联的影响,探讨他们在哪些方面做得特别好、哪些方面做得没那么好。所以,既有时间上的,也有部门上的……[柯伟林:还有地理上的]对,还有地区上的(差异)。

韩博天: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工业、科技和投资,事实上,这些正是中国从一开始就真正极大地依赖于苏联的。这种依赖在地理上很集中,首先从东北开始。我记得刚读过沈志华编辑出版的一些文献,他那些文献就来自重建东北初期非常活跃的数百个苏联顾问。尤其是铁道兵,重建这个铁路军事组织或许也是苏联的主意。我认为铁道兵来自苏联的传统,因为他们有同样的问题:空间巨大,缺乏严密控制,所以首先必须要控制这些生命线系统。说到计划问题,现在我的看法是苏联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决定性的。我们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是什么样的?它肯定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短训班的核心内容,就是这样一些想法。

我认为李华钰的研究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她说毛泽东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时其实是斯大林的紧密追随者,一个亦步亦趋的跟随者——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然后中国人就开始进行筛选,很有意思。陈云其实是很信任正在运行的苏维埃制度的,但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毛泽东,大规模收购私营部门之类的做法,即使有苏联顾问的支

持也不能全盘照搬。所以说同一时期的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是正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 156 个关键项目,首先总是要设立一个司令部,一个负责其事的高层指挥机构,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些机构仍然存在。在大多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第一步就是要成立一个高层的全权指挥机构,上海高架铁路就是这样做的。直到今天,在基础设施项目的程序中还有这样的司令部,它们其实是来自 1950 年代 156 个项目的遗产。所以,我们必须考量这些影响的相互性。

还有游击战式的政策风格,很早就被置入计划程序中的灵活性,甚至 1952 年、1953 年的计划程序就很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在一个计划的中期对它进行修正——事实上,我们今天仍在这么做。现在中国的经济规划仍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有许多纠错机制,甚至在系统中设立了正式的中期评估。所以并不是你一开始确定的东西,整个五年里都必须遵循它,已经不再是这种情况了,而是要进行定期的评估。所以我会根据地理、部门、时期等因素来权衡这些影响。我还想说,国家资源委员会成员的影响在最初几年里是最大的,随后就开始下降,尤其是到 1952 年,决策层已经向他们关闭了,技术工程师、首席工程师则在他们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到 50 年代末。所以中国是通过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来建立对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政治控制的。就苏联模式而言,它并不是那么简单。我认为苏联模式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中国需要它们,而不是强加给他们的。

柯丽莎:说到东北,我认为这里的问题是地区差异,当然苏联在东北接管铁路方面有更大的影响,这里得到了更多的工程和技术上的帮助。当然还有投资,因为钢铁工业是优先发展的。但是总体说来,我认为我们对东北了解得非常多,而对中国其他地区——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地区——的铁路系统知之甚少。当你转向西南和西部地区时,就会发现苏联的影响减弱了。但那里也有铁道部雇用的苏联工程师,在 50 年代初的宣传文学和电影上可以看到,这是毫无疑问的。[韩博天:有东德顾问吗?我认为铁路车厢是由东德设计者建造的。]是的,是有一些东德顾问。

问:我想问 Heilmann 教授一个问题,一个关

于方法论的问题。你提到苏联的影响、国民党的影响,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从文献上梳理出这些不同的影响呢?因为在地方层次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谈到这种影响,他们甚至不用这方面的术语,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讨论问题。我仅仅是在地方层次上观察,所以……

韩博天:我想,要在中文文献和官方语言中识别出不断变动的影响,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其实是去分析术语。如果你在民国时期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文献中突然发现了来自苏联的技术术语,或者来自德国区域规划的术语,那么我想说,这些就是你可以用来识别我所说的“硬联系”(hard linkages)的标志。因为如果没有那些通常来自国外资源的直接影响,这些术语是不会出现的。在理解不断变动的影响方面,这种做法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当大的帮助。我曾经尝试分析“试点”、“由点到面”等术语,探讨这种以试验为基础的政策过程,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所以你可以在时间轴线上向前追溯,看这些术语的起源在哪里,它们来自何处,然后通过文献的变化去追溯。从方法论上说,那将是一个很有趣、很实在的硬联系,因为这些术语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但是那只是一个方面,从人事上探讨延续性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问:把 Kirby 教授的开场辞和杨奎松教授的发言拿来比较,是很有趣的。从 Kirby 教授的发言中我看到了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崛起,看到了巨大的进步。而从杨奎松教授的发言里我们看到更多负面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所以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看法,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接下来中国的未来会怎样呢?

柯伟林:我的天啦!那我就妄言几句吧。我对中国的未来是很乐观的,不论是它的经济发展还是国际影响力。它有教育水平很高、而且非常勤奋的人民。我没有长远的预测,但是我认为中国会繁荣很长一段时间。在本世纪之前还有过很多个中国的世纪,如果这真是一个中国的世纪,它不会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世纪,这是一项国际合作的事情。

中国的繁荣只有通过贸易、投资、发展、全球人才的流动来维持。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很乐观的呢?这和解放军以及其他被忽略的

事情有关。如果大家担心中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时期,过去 30 年来中国的边境第一次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包括俄罗斯、日本、美国、印度,现在没有敌人威胁中国的边境。但是,对这个体制的所有威胁都来自内部。大家知道,即使在民国时期,在统治最松散的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核心区域也没有以任何显而易见的方式独立。有各种各样的区域自治、各种各样的独立宣言,但它们没有说是从哪里独立、向谁抗议。新疆和西藏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有中央权威的中国政府都有把这个国家像以前一样整合起来的军事和政治能力。

所以我经常问自己、但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而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看起来那么不安全?为什么他们赋予位于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国家安全部以巨大权力?这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当我和学生们谈话时他们会问类似的问题。我的答案也正是 John Wills 在他关于澳门葡萄牙人的论著中给出的答案。Wills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学家,现在已经从南加州大学退休了。他说,葡萄牙人很早就到了澳门,在明朝知道他们之前已在那里呆了十多年。明政府知道以后很抓狂,他们筑墙防御,禁止任何联系。他的问题和我对学生们提的问题一样: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最先进的伟大的明帝国,怎么会害怕自己海岸上那一群体味难闻、感染梅毒的欧洲人呢?Wills 的答案是,他们很清楚(比我们更清楚)自己的控制系统其实是多么的脆弱。当然,大家知道,在任何现代意义上,明朝的控制系统要比今天的人民共和国脆弱得多。但今天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广泛的不安全感,如果观察和思考一下过去十年间国家内部的安全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就更是如此。

我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和哈佛商学院的同事会见一位非常重要的中国商界人士,我这位来自南亚的同事对他说:“你知道,这些问题在印度都存在,民主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它们,中国在这方面、那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如果中国有选举的话,毫无疑问共产党会赢。”他就是这么说的。然而这位极其有名、极有影响力的商人说:“不,我不这样认为。”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我不知道,当然,选举结果取决于他们如何组织。所以像中国

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成功的地方今天仍会如此缺乏安全感,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谜题。

裴宜理:上星期,我感觉波士顿这里好像成了一个武装军营(按:2013 年 4 月 15 日波士顿发生爆炸案,在追捕嫌犯过程中曾关闭全城所有公共交通系统,并建议市民及私家车不要出门),这表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动荡世界里,我们的国家也会有全国性的、巨大的不安全感。9·11 事件之后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系统去处理危机,你不知道它究竟是不是危机,但每一个人都无处躲藏。比较一下世界各国如何处理他们所定义的安全问题,无论是恐怖主义、公共健康,还是全国性疾病、海啸、地震等等,我们都会发现另一种意义上的合流。这也是相当可怕的。

#### 第二场:新旧混杂的 1950 年代

王笛(得克萨斯 A&M 大学):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兴起:1950 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

我的文章聚焦于社会最底层,这是我最近一本书的一部分,该书探讨的是 1950 年到 2000 年成都茶馆的转型,探讨在共产革命下公共生活的变迁,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对日常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我要讨论的成都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但是成都,直到 12 月底,准确地说是 12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进入成都市,然后立即着手执行控制公共娱乐活动的计划。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后,权力真正渗透到了最底层,国家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渗透强度是国民党政权或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难以企及的。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试图巩固权力,消除传统——尤其是传统娱乐活动——的影响,建立社会主义娱乐体系。

当然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 1950 年到 1960 年,共产党实现了他们的大部分目标。我们看到,共产政权在控制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是要探讨他们如何实现这种控制。我主要讨论了国家控制的三个方面。首先是共产党如何接管传统娱乐和娱乐业,例如控制戏园和茶馆。其次我想着重考察中国政府如何取缔一种传统的娱乐方

式——围鼓,人们到茶馆里去听地方戏,这是一种传统的消遣方式,但政府取缔了它,并把围鼓艺人赶走。再次,我想看看共产党的政策是怎样落实、怎样执行的,通过这个过程,可以看到人们对党的政策是如何抵制、如何应对的。

所以首先,(1950年)1月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仅仅三天后,他们马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接管文化教育工作,称为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2月,也就是控制该市一个月后,成立军事接管小组。3月成立成都市戏曲改革工作委员会,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人们进行“积极引导”,去影响那些曲艺艺人。1952年成立曲艺改革协会,实行“三改政策”,这项政策是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制定的。因为1951年中央政府颁布过一个《关于戏剧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实行三项改革政策,即对艺人、戏曲和制度进行改革,当时叫做“改人改戏改制度”。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接管这些戏班和戏园的。大家知道,直到1949年,成都传统上一直是蓬勃兴盛的茶馆业的翘楚,是中国茶馆数量最多的地方。大部分茶馆同时也是地方戏园,人们去那里听评书和地方曲艺,在成都被称为“书场”。1949年成都共有24个茶馆书场。共产党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他们允许茶馆书场继续营业。新政府同时又设立了新的组织和戏园,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叫五月文化服务社,是解放军入城四个月的时候成立的,得到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批准。该组织的任务,就是要提供——用当时的术语来说——“革命的大众娱乐”。服务社很快创办了新的戏园,先后设立第一实验书场、第二实验书场。这些书场基本上都是表演革命节目,试图用新节目去影响或教育人们。设立五月书场的目的就在于此,这是一种公共性书场。大家也许会想为什么要用五月这个名字,因为五月是红色的月份,劳动节、马克思的生日、还有很多政治运动都发生在五月,所以他们用五月来命名。服务社又创办了五月文娱茶园,作为“宣传和教育的场所”。所以很清楚,创办、使用这些茶园,主要是为了宣传和教育的目的。这个服务社是初期形式,是先锋,到1956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换了一个新名称——成都市群众艺术馆,事实上这个名称到今天仍在用,仍在宣传工作和公

共娱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接下来我讲一讲取缔围鼓的情况。围鼓是一种传统曲艺形式,今天大家去成都的话,还能看到很多人坐在茶馆里看戏,他们叫做“打围鼓”——因为没有化妆,没有服饰,仅仅是坐在那里打发时间——观众们可以观看他们的曲艺表演,那是一种传统的娱乐方式。但是中国共产党接管成都后,很快认定这种活动是袍哥的消遣方式,袍哥是一种穿长衫、讲究兄弟义气的秘密会社组织。这就给这种活动判了死刑,因为袍哥已被界定为反革命组织。但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只不过是普通人的自我娱乐而已,当然也有一些袍哥成员参加了这些活动。当政府将其认定为袍哥活动时,它们很快就存在不下去了,“与袍哥活动同时绝迹”。

但它只中断了很短的时间,1953年又开始复苏。但是政府,尤其是文化局,指责他们的戏目“污蔑历史英雄”、唱“淫荡猥亵”的唱词。文化局随即对他们进行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根据调查情况,对参加这类活动的人进行仔细的认定和分类。共查出12处围鼓,从业者86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党员2人,三青团员1人,特务12人,袍哥大爷4人,一般袍哥成员19人,此外还有一贯道1人,撤管烟毒犯1人,甲长3人。据认定,参加围鼓活动的全都是“历史政治情况极复杂”的人,这就提供了一个打击这类活动的很好的借口。所以文化局、公安局、民政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一个《对现有川剧围鼓的处理意见》,试图迅速制止这些活动。这几个机构声称,过去的围鼓主要是贩卖和娱乐活动,但是最近复苏后出现了职业化的趋势,过去他们只想在茶馆里消磨时间,现在却靠这种活动为生,不利于对袍哥成员进行劳动改造。

他们把这些从业人员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专业演唱者,有很好的表演技巧,没有什么背景,这些人被允许继续通过演唱谋生。第二类允许暂时演唱,但须在当地政府注册,并逐步让其转业。第三类是原戏班的学员,比较年轻,正在接受曲艺训练,他们也可以暂时演唱,但也须另转他业。第四类大多是家庭主妇,必须动员她们停止演唱。第五类大多来自成都以外地区,对这些人必须劝其还乡。最后一类是年老残废无生活能力者,应予

收容救济和改造。但我没有时间去详细讨论他们是怎样执行这些政策的。大致说来,对这六类人有不同的政策,一些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一些被遣送出城市,但这些人,特别是被遣送走的人,后来又返回成都并继续从事这些活动。所以我想说,这里确实有一种弱者的抵抗,在政府强迫他们离开时,他们不得不离开,但是他们也有机会再返回城市,政府真的很难完全控制他们。

从文化局的档案文件来看,他们指责市政府、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没有认真处理“暂唱”和“暂唱转业”的期限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地方官员的合作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这里我要解释文化局和地方官员对这种控制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文化局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娱乐,并把传统娱乐活动改造成一种宣传工具;但对街道办事处或区政府的地方官员来说,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更关心那些人的生计问题,因为在主要的戏园和戏班取缔之后,许多人失去了生计,所以他们必须帮这些人找到谋生之道。

我也探讨了为什么新政府要采取这一政策来打击大众娱乐,我相信这并非新事物。事实上,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精英和国家在不断地攻击大众娱乐,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延续性。在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政权后,他们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认为这些人需要改造,这些坏分子需要肃清,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文明、更健康的娱乐体系。事实上,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都是这么做的。

我还想说最后一点。有这么多家庭妇女加入唱围鼓的行当,文化局和其他机构劝她们退出,说这不是一份健康的工作。这些妇女回答说,她们去唱围鼓是因为她们真的想要有自己的工作,想要经济独立。但现在她们说:“好吧,我错了,我打算回家再去做家庭妇女。”在政府的文件中,妇女们的这类话语是用一种积极的语调表达出来的,这其实和共产党经常说的要解放妇女、让妇女走出家庭、获得经济独立是相互矛盾的,二者很不相同。我相信,当时对共产党、对文化局来说,建立社会主义娱乐、建立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要比妇女解放更加重要。谢谢大家。

孙江(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文本中的故事:  
1950 年代一贯道话语的阅读

我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到目前为止一

直任教于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明年我会回自己的母校南京大学工作。由于这个缘故,我的英语已经被淡忘了,所以我只能读一下这篇文章的摘要。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出了这句著名的话语,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的确,那些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被镇压的“人民的敌人”,无论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异,都被贴上了一个共同的标签——反革命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反革命分子”是一个范围极广而又含糊不清的概念,指向那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官僚、资本家、土匪、以及民间宗教结社(它们被称为“反动会道门”)有关的个人和组织。1950 年代,中共镇压反动会道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一贯道。为什么一贯道会被视为反革命呢?究竟是一贯道反革命,还是这场革命反一贯道?我将解释一贯道被视为反革命的原因,进而审视 1949 年革命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文章的第一部分讨论政治话语。很长一个时期,和当局对一贯道的谴责相比,人们对它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主要来自中共镇压一贯道时出版的一些材料。1951 年一本署名“春阳”的小册子《一贯道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例,作者声称这本小册子是“依据北京市破获的一贯道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写成的”。该小册子的核心在于揭露和批判一贯道政治立场的“反动性”,这一点贯穿了全书各个章节。第一章开篇写道:“一贯道是封建迷信会门之一,在国民党潜伏特务、政治土匪和恶霸地主的操纵下,实际上已成为进行反革命反人民的活动的反动组织”。就是说,一贯道内部存在各种“反革命分子”。不仅如此,“日伪时期,一贯道成了敌伪麻醉人民、压榨人民、破坏抗战的工具,它的发展,受到敌伪的支持”。

春阳的批判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伦理批判,一是政治批判。他的批判仍然影响着今天的历史叙述。1998 年以后,一些著作使用尚未公开的公安档案,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一贯道内幕,但是,在对一贯道性质的认识上,这些著作和春阳的小册子并无二致。在此,直接阅读被批判一方的文本,即构成春阳一贯道批判之“底本”的当事人的供词,也许可以发现解释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第二部分是一个囚犯的自白。承陆仲伟先生的好意,我得以阅读张英誉及其他几位案犯所写的供词。张英誉是一贯道第 18 代教祖张光璧之子,1951 年 4 月 13 日在广州被捕,旋被押解至上海。在狱中,张英誉用漂亮的钢笔字写下了很多供词,仅我所阅读的就四种,计 15 万字。

阅读过清代“邪教案”中案犯供词的学者都知道,解读供词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供词是在特定条件下制作出来的,如果不加甄别地引用很可能重复文本中的虚构。狱中的张英誉十分苦闷。他在第三份供词中写道:“吾是无一技之长,将来如何办法,家庭生活如何解决,是否政府能许可吾来参加革命,境遇许可吗?尤其吾这操劳一生老母,老来不得享点天伦之乐,未免太对不起良心吧,一连串的顾虑全来了,真如烈火烧心,芒刺拊背,感觉百无生趣了”。在第一份供词中,张英誉否认一贯道是“反动会道门”,强调一贯道在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期间没有到“敌伪”政府登记。他写道:“在政府明令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时候,一贯道也赫然在列,吾深表诧异,一贯道称作迷信团体可以,为什么加入在反动会道门中呢?虽然在想在索求,总找不出个道理来,甚至怀疑政府为取缔一贯道而不得不加以反动之名。”

对于张英誉这样顽固的一贯道信徒,公安人员对其进行阶级教育。一位姓毛的股长说:“现在的革命不只是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命,是革数千年未被人发现的命:阶级的命,以及一般封建者、剥削者、反动份子的命,凡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翻身事业大路上之障碍滓渣,和与人民为敌者的命”。这似乎在张英誉身上发生了作用:“吾对阶级这个名词陌生得很,对于它的意义尚不明了,自从说听了毛股长谈话以后,曾加仔细思索……于是更增加了吾对政府取缔道务的信心,义(毅)然决然也协助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张的觉悟只是停留在言辞上,看不到他揭发自己家庭和其他道徒“罪行”的文字。因此,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称他:“非常滑头,坦白避重就轻,对自己的罪恶认识不够”。

第三部分涉及如何判断文本。历史是表象的产物。面对春阳与张英誉截然对立的一贯道叙述,历史学者应该如何评判呢?一贯道在日军占领地区发展迅速,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有争议

的是,到底是如春阳所说因为一贯道是汉奸组织才得到了发展呢?还是如张英誉所称因为一贯道“入道免劫”的教义对民众有吸引力?在此,历史学者的判断很容易陷入亦此亦彼的相对主义境地,因为作为表象的历史在史料制作阶段即已加入了当事人的不同意见。

和伪满统治一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乙种宗教”属于何种宗教系统、有无向地方当局登记极为关心,时刻防范这类宗教结社成为反日势力。可见,尽管一贯道和日伪统治存在各种各样的人事联系,但它不是汉奸组织。这一结论在战后围绕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没收一贯道财产的诉讼中即已得出。意味深长的是,所谓一贯道是汉奸组织的说法,追根溯源,是和国民政府有关的。

最后略作总结。我在拙著《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秘密结社》中批判以往的“秘密结社”话语,将秘密结社界定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上的“纽结”。在拙著《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与权力》中,我进一步强调关于结社的研究需要来一次“认识论的转变”,应该通过具体案例观察结社是如何被政治化的,从而揭露结社叙述中的“虚构”。如果在全球史视野下把中国的结社与欧美的市民结社作比较的话,我们难道不能从以兄弟结义为纽带、以互助为宗旨的帮会结社(青帮、红帮)中找到市民结社的影子吗?如果除去宗教和迷信的成分,以慈善和修行为特征的宗教结社与欧美俱乐部、协会等以德智向上为目的的结社又有多大区别呢?

如果在结社研究上实现“认识论的转变”,则不难发现,结社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挑战了政治的合法性。是的,从帝制晚期到人民共和国时代,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把自身视为不同利益的归结点和代表,结社问题总是和权力合法性联系在一起。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但它是同一本旧书上的新一页,革命下的政治继续谱写着关于宗教结社的老故事。所以当半个世纪后有人喧嚷要“告别革命”的时候,我们发现革命早已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套用 Perry 教授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回答:研究中国,焉能告别革命?谢谢。

戴茂功(Neil Diamant,迪金森学院):谈革命:1954 年宪法草案讨论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我要感谢各方及各位对我的邀请,感谢里峰的组织工作,感谢 Lindsay 的繁琐杂务,还要感谢 Liz 签支票。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课题,我从去年十月才真正开始着手这项工作,这意味着我今天讲的每一个观点可能都是有待商榷的。这项研究是和另一项关于中国当代退伍军人的研究相关联的,他们现在也使用博客、互联网邮件之类的交流方式。我试着去平衡这两项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给出的提纲还比较粗糙——通常我不给提纲,而是直接提交论文。对我来说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说自己在研究一个新的课题。最近三年我在做一个关于公共卫生的课题,考察国家和民众是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卫生问题的,但是我只找到了一些公共卫生运动的材料。所以我放弃了这个题目,想着“嗯,我该怎么办呢?”

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决定去研究宪法。我在上海研究退伍军人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样一份文件,说退伍军人是全市唯一不用组织起来去学习宪法的群体。在这场全国性运动中,所有人都被组织起来学习宪法,只有退伍军人除外。这个细节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中,让我很是好奇。其次,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研究的课题。1954 年春夏两季发生了一场讨论宪法的全国性运动,但相关的材料非常少,我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关于宪法讨论的深入研究。此外它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地感受这一时期的人们如何理解这个国家,他们谈论的共同话题是什么,因为关于宪法的讨论和评价可以从 1954 年延伸到“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甚至民主墙运动。我认为之前还没有人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

大家在 PPT 上可以看到这些游行的人群,他们在欢迎宪法的到来。再说说我的资料来源——毕竟才三个月时间,我所做的还非常有限。我检索了 1954 年后《内部参考》上几乎所有跟宪法有关的内容,现在通过数据库进行检索非常容易。如我所说,这是一场重要的运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宪法讨论办公室,在每一个档案馆里都有这样的材料。但是,由于政府对中央文件有严格限制,所以很难找到中央发布的关于宪法的文件,在上海也是如此,没有关于宪法的总结报告和调查报

告——也许有一些这样的材料,但我没法找到它们。我在资料上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农村地区的材料很少。冯筱才在和我一起做这个研究,至少在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内部参考》主要侧重于资本家,关于资本家、精英、民主党派的材料有很多,但是关于农村和普通工人的材料不太多。即便是研究精英,你会发现被采访的也主要是那些已经认同现政权的精英,他们被安排参加会议并被告知该说些什么,在此意义上他们发挥的只是传声筒的作用。

(屏幕上)这是另一份有趣的资料,是人们不同观点的材料汇编,大概有六、七种这样的汇编保存了下来。得到这份资料很不容易,但冯筱才和我终于弄到了一份复印件。这是我正在考察的 1950 年代末的材料,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数据库,用“宪法”作为关键词搜索有大概 1000 条结果。专门探讨这一时期宪法问题的文章非常少,但在“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期间的各种抱怨中都提到了宪法,抱怨人们对宪法的态度过于当真,而且对宪法采取了西方式的理解。有很多材料都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场关于宪法的讨论呢?当时人们对宪法做了大量的讨论,但是当我们的宪法——美国宪法——诞生的时候,普通民众并没有去讨论它,被召集起来批准宪法的那些人都是各州代表,他们不是普通人。保留下来的文件中记载了这些精英对宪法有什么反应,他们有哪些不满。还有苏联模式和 1936 年苏联宪法。有人认为毛泽东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但是考虑到斯大林 1953 年去世,而关于宪法的讨论发生在 1954 年,这种看法不太有说服力。很可能这是用来征求意见的群众路线政治的一种标准程式。筱才认为这是一种搜集政治情报的方式,大规模搜集人们的观点,用来服务于国家。你可以随时去档案馆搜寻某人的评论,用作对付他们的工具。

宪法草案出台的时间,对这里的讨论很重要。它发生在 1954 年的春夏之际,也就是说,是在土地改革、婚姻法、五反运动、粮食统购统销之后。换句话说,宪法草案是晚于或略早于许多革命性政策出台的。因此到这时,人们对共产党究竟怎么样已经有真实的感受了。由此,我的初衷就是把关于宪法的讨论作为一种调查报告,探讨当时

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我们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宪法的涵盖面相当广泛。人们讨论征兵、公民权、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等，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宪法之中。人们被要求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尽管他们参加的是小型会议，而且发言会被记录下来，他们对宪法事项的评论仍然相当广泛和坦率，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发言是安全的。讨论由共产党发动，通常是有人带头发言，其他人就会安全地跟着发言。但是看的材料越多，我越感到这种看法是有局限性的，至少在考虑到时间问题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人们不仅讨论 50 年代后期，也会涉及 40 年代后期的情况，这段时期对他们来说仍然记忆犹新，他们会把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系起来。人们也在思考，通过这部新宪法他们能从共产党那儿获得什么。所以，这里不但有对过去的关注、对当下宪法是怎么回事的关注，还有通过宪法对未来的期盼。这是一场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进行的对话。

我想关注对宪法的一些误解，当时文件中充斥着被认为是思想混乱或误解宪法的内容，可后来证明，这些错误有许多恰恰说到了点子上。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误解宪法的人实际上是正确的。所以我想做的，就是考察一连串语言上的误解和观念上的误解。下面就是几个这样的例子。

戏法(theatre law)。宪法和戏有什么关系？好，在上海话里“戏法”是怎么说的，“宪法”又是怎么说的？Xifa，他们告诉我都是这样发音。所以，当干部们前去讨论宪法的时候，人们认为他们谈的不是宪法，而是戏法。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想法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部分反映了普通人对中国宪法的观点，基本上把它当作一种戏法。国民党有宪法，但是没人真正遵守它。共产党出台了自已的宪法，而它好像是某种戏院式的国家公开表演。与此同时，当时还有一种想法是，共产党已经有太多的法律、太多的规范了，他们干嘛还要通过一项关于戏的专门法呢？那接下来呢？所以有些人说：“接下来大家知道，会出来一部关于雨的法律。”还有别的什么会成为共产党制定法律的对象呢？

死法(death law)。这同样和来自上海话的误读有关，宪法被错误地读成 sifa，但这显然不是随意发生的。因为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之后，共产党被认为是一个执行死刑的机构，人们不会把这个政党跟其他的政党相混淆。所以对他们来说，共产党制定一部决定他人生死的法律是完全合理的，这样就有了死法。

宪兵法(military police law)。这儿他们正确理解了“宪”，却加上了一个“兵”字。“宪”字的确出现在宪法中，“兵”字也的确出现在宪法中，可它们并不是同时出现的，那么“宪兵”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国民党，国民党的宪兵或者说军事警察因为强制高压、无法无天、滥用权力而臭名昭著。对许多人来说，把法律和宪兵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危险、糟糕的提议，因为在过去跟宪兵打交道总是非常危险的。

险法(danger law)。这一次不是发音错误的问题了，我认为有一种不难理解的总体性差异。大多数人不了解“宪”或者宪法的含义，因而他们提出了“险法”(danger law)或者“限法”(restriction law)，对“宪”的解释各不相同。二者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共产党不仅仅是解放者，同时也大大限制了人们的自由生活。还有一种变体，指限制法国侵略的法律。为什么法国会出现在宪法讨论的背景中？因为就在宪法讨论进行的过程中，召开了日内瓦会议，法国经常在新闻里出现，所以人们把宪法讨论和法国联系起来。有一种普遍的理解或者说误解：“既然新闻里面有法国，他们肯定是在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所以这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法国的。”必须限制法国，防止它侵略我们。这不仅是理解宪法中的又一个错误，当时也有其意义在。

对 xian 的另一种理解则在年长的女佛教徒——我对她们脑子里的想法总是很感兴趣——中非常盛行：共产党为什么要实施一部“仙法”(celestial being law)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宪”字的很好的理解，这里你会感觉到，人们在用他们理解社会生活的方式去理解自己的政治生活。

还有另外一种误解是“先法”(before law)，也是同样的发音，不同的汉字，它也引发了一些人的忧虑：如果共产党在当时做的事情多少是危险的，而这些都属于“先法”，那么“后法”又会怎样呢？文件中写道：“后法是什么东西？”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宪法号召消灭富农经济，那“后法”颁布之后被消灭的又会是谁？

还有减法 (subtraction law) 和草法 (grass law), 这些说法和宪法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更多地是在强制施行的政治背景下对宪法内容所作的评论。宪法有效地终结了延续到 1950 年代的新民主主义遗产, 使用了“消灭”一类的字眼。它宣称共产党代表工农联盟, 要求宣传人员强调宪法的阶级性, 把城乡社会中的富裕人群作为打击对象, 私有财产要由政府没收。换句话说, 宪法主要是要拿走人们的财产, 要减去 (subtracting) 一些东西。草法主要跟农村地区有关, 是针对统购统销政策和打击富农经济的后果所作的评论。意思是说, 如果继续执行当前的政策, 人们已经或者将要食草度日了。

还有就是母法 (mother law)。这个说法来自官方宣传, 非常有趣。人们被告知宪法是国家的母法, 这是一种生物学的类比, 所有其他法律都是从母法衍生出来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如果宪法是母法, 其他法律是子法, 为什么子法先于母法产生呢? 换言之, 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出现得都比宪法早, 它们在母亲之前出生, 难道是私生子吗? 这怎么可能呢? 这种类比纯粹是在法律概念上展开的, 结果把时间顺序全搞乱了。

宪法对国旗做了规定, 人们知道了国旗的概念。许多人想知道为什么国旗上有四颗小星星, 既然共产党人打算消灭两个阶级, 既然在宪法里只需要两个阶级, 为什么要在国旗上放四颗星星呢? 人们对此确实有些忧虑。政府将来是不是得把所有的国旗都改掉? 为什么那么多国旗上星星的数目都不对? 还有一个遍及全国的疑问: 为什么宪法没有规定国歌? 全国人民都想知道原因何在。还有, 为什么要把北京作为首都? 人们对首都选址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认为北京要当首都太遥远、太落后了。

还有一些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很令人困惑的具体条款, 例如宗教信仰自由。这怎么可能?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迷信发起过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 1950 年代初就损毁了许多寺庙, 难道政策变了吗? 警察感到非常困惑, 他们是否应该停止执行对宗教活动的禁令呢? 他们问“跳神活动现在允许吗? 什么是迷信, 什么是宗教? 人们想着这些事情, 想着这个法律到底意味着什么。”

还有第 90 条,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通信秘

密受法律的保护, 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这怎么可能呢? 在五反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这些规定没有一条是真的, 住宅当然会受到侵犯, 人们的生活被完全打乱。所以这部宪法似乎真的是戏法, 它的意义何在?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会截留信件, 这种做法再正常不过了, 特别是在潜藏有颠覆分子的情况下。于是人们提出了法律上的疑问: 反革命分子有通信的权利吗? 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如果有人和与其他人结婚的妇女通信呢? 宪法允许这种情况吗? 再比如迁徙的自由, 农民可以迁往城市吗? 允许这样吗? 公安部门的户籍政策改变了吗?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们可以对宪法做出不同的解读, 通过对比先前国民党的宪法, 去理解宪法的含义, 弄清楚这个新政权的实际政策及政策偏好是什么, 以及宪法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享有权利, 这些权利能否得到施行? 这些问题当然也是如今宪法要回答的问题。习近平说应该更严肃地对待宪法, 对《南方周末》宪政议题的言论审查, 现在已经引起了抗议。现行宪法和 1954 年宪法并不是全然不同的。所以, 我的研究尝试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对宪政进行考察, 我们想知道宪政意味着什么, 它是如何实施, 人们是如何理解它的。

从学科属性来说, 它是一项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 总体而言, 对政治学家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宪法长期以来都被当作政治学系的面包和黄油,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 50 年代或 60 年代的宪法问题。我想主要的问题在历史学家这边, 如今历史学家能够对 1950 年代进行合法的研究, 这完全不成问题, 已经有一个群体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是, 一旦转移到 60 年代末、70 年代或者 80 年代初, 历史学家在什么意义上还能把改革初期作为历史研究的合法议题呢? 是在 80 年代初出现了一部新宪法、后来又被修订了的意义上吗?

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吧, 我不想扯得太远, 大概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再次声明, 这项研究才刚刚开始, 我只得到两年 3000 美元的研究经费, 以这样的速度, 也许十年后才会真正有所突破。谢谢。

阎小波 (南京大学): 共和体制的蜕变: 1911

## 年与 1949 年中国革命结果之比较

各位教授,大家好。我首先要感谢 Perry 教授的邀请,还要感谢在座的华东师大的张济顺教授。我是 20 年前从华东师大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感谢母校的培养。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李里峰教授,他组织了这样一个工作坊。

我给大家报告的内容是,比较一下中国的 1911 年革命和 1949 年革命所带来的成果,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成果,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一般认为 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是一场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 1949 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是一场列宁主义的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场革命有新与旧、成功与失败以及性质上的差别。我想讨论的是,其实这两场革命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最大的一个相似之处,是这两次革命以后建立的政权都属于共和体制。接下来重点要讨论是,这两场革命建立的共和体制,为什么到了 1914 年和 1954 年以后就开始蜕变。

讨论这个议题,我有三个基本的预设。第一个预设,这两场中国革命的逻辑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暴易暴,它有自己的特色,就是说两场革命推翻了暴政,取而代之的不是另外一个暴政,至少短期内不是的。第二个预设,这两场革命以后建立的政权都是共和体制,不是专制体制。第三个预设,这两个共和体制建立以后,经过了三年、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慢慢地蜕变了,没有能继续巩固这样一个共和体制。

首先要探讨一下这两次革命,或者两次共和体制建立的历史背景。中国从鸦片战争跟西方交往以来,对西方民主的认知是非常表面的。到了 1894 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很多精英人物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军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落后于日本。所以在 1894 年以后,有些精英人物就提出来中国要搞民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甲午以后,精英人物通过办报纸、办学堂、设社团,在上层社会宣扬民主、议会、选举、宪法等西方民主的元素。到了 20 世纪初的时候,清王朝也开始了改革,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启动预备立宪等等。所以说,在 1911 年之前,中国有关民主的讨论在持续升温。当然这种升温更多的在精英群体内部,底层的农民和老百

姓对这样的讨论是不太关注的。

关于第二次革命,也就是 1949 年革命之前,可以说有关共和体制和民主的讨论也是在不断地升温。因为共产党在 1921 年成立的时候就强调追求民主,采取无限制的民主选举,建立共和体制。在整个 20 年代、30 年代,包括到 40 年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抗,其实不只是一种军事的对抗,还包括了政治对抗。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搞一党独裁,搞专制,所以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共和体制、联合政府。

总体来看,在这两个政权建立之前的 20 年、30 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都在讨论民主的话题,希望今后建立的政权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共和的、宪政的政权。换言之,共和、民主在中国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其次是这两个共和体制建立的过程。关于 1911 年的革命,清王朝退位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早在 1920 年代,英国的罗素把这场革命与英国的 1688 年革命做了一个比较,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两次革命的所谓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暴力是很有限的,然后都有一个和平谈判的过程,并且都保留了皇帝这样一个符号。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之前有一个“议和”的过程,他们是南方的孙中山、北方的袁世凯、还有朝廷,三方在那儿不断地谈判、协商,谈判到最后大家签字,皇帝制度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共和体制。

关于 1949 年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是用暴力颠覆了国民党政权,旧政权是被枪杆子打垮的,但是新政权的建立也是经过了协商和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不完全是共产党单方面的政治力量自主地制定和设计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首先承诺,未来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党的、联合的、民主的、共和的政府。所以说到了 1949 年共产党进入北京以后,把其他的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政治党派,都邀请到北京去。然后共产党是一方,其他党派是另外一方,经过了几个月的协商,最后成立的政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无论是 1912 年的政权还是 1949 年新的政权,其建立的过程都充满了协商,都有一个“议”或“谈”的过程。刚刚建立的时候,它都有各种政治

力量参与其中,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党专政的,有诸多政治力量合作共建。比如说 1949 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共产党在其中所占有的席位差不多一半左右,比如副总理、部长等很多席位都给了其他党派,这是一个多党的民主联合政府。总之,在这两场革命以后,新政权的建立都有一个谈判、协商、广泛沟通的过程。

第三个问题是这两个共和体制建立以后如何慢慢地蜕变了。我想先讨论一下这两个共和体制建立以后的运作成效。1912 年北京政府建立以后,运作的成效比较差,它无法来维持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正常运转。北京政权 1912 年建立以后,从国家的物理形态来看,外蒙古实际上独立出去了,国家主权开始流失。它的内部治理绩效也很差,难以维持一个正常国家的社会秩序。所以 1912 年新政权建立以后,整个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制的秩序不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是无法维持,进入了一个衰败的通道,地方上军事力量的崛起也在分割国家的权力,中央权威几乎流失殆尽。这是 1912 年共和体制建立以后的情况,可以说外交与内治均很失败。

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的状况与 1912 年相比正好相反。1949 年政权建立以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后来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也提升了国民对新政权的信心。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无论是从物理国家,还是从政治国家来看,政权的治理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绩效。可以说这两个共和体制蜕变的背景有一个巨大的反差:1912 年的政权无法有效治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没有权威;而 1949 年共和体制建立以后,治理的绩效是比较好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不断上升。那么,这两个执政绩效差异很大的共和体制,为什么后来都蜕变了?

我先讲第一个共和体制的蜕变。1912 年共和体制建立以后,它的蜕变经过了几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 1913 年,国民党参加国会大选的领袖宋教仁,也是候任的总理,在选举结束以后被杀了。接下来国民党被袁世凯非法取缔,导致 1913 年选举出来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无法运转。因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里面国民党占据了一半以上,而国民党被袁世凯取缔以后,国会就瘫痪了。接下来到了 1914 年的时候,袁世凯颁布了

一个《中华民国约法》,也就是“袁记约法”,赋予大总统以无限的权力。1916 年袁世凯干脆就做了皇帝。到了这个时候,共和体制就名实俱亡了。

1949 年共和体制的蜕变大体上经过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 1954 年宪法的颁布,新的宪法取代了 1949 年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1954 年宪法颁布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接下来召开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年的“两会”进行了政治资源的再分配,非中共人士有不少从“一府两院”系统转入了人大与政协系统。第二时间节点是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的展开对其他党派的精英压力很大,其中有不少被打成了右派,退出了政权系统。从 1957 年开始,原先的多党联合形成的政权差不多就变成了中共一党执政、多党参与的政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共和体制建立以后无法巩固下来、逐渐蜕变的现象呢?我想个中的原因是比较多的。1911 年的革命受到西方的影响,而 1949 年的革命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外部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并影响政权的走向。我在这里主要讨论中国内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今天就不讨论了。内部的因素主要讲两点,首先是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按照中国的传统,军队是忠于个人或者忠于皇帝,它不是效忠于一个王朝或者共同体,这是中国政治传统。所以我们看 1911 年革命以后,孙中山失去了临时大总统,与他对军事力量控制比较少有很大的关系。袁世凯之所以做上大总统,跟他拥有对全国军队的支配权有很大关系。而后来袁称帝失败,也与军人的反叛有关。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一直是强调军事和政治统一。这样一个状况跟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讲的现代国家应该是军事和政治隔离、军事和社会隔离、军事专业化的取向有很大的差别。

其次,跟中国政治传统有关系。中国几千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传统,我把它称之为“政治一元主义”。这个政治一元主义的传统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一、中国是唯一的大一统的天朝,不存在与天朝平起平坐的政治共同体;二、天子在制度设计中间拥有无限的排他性的权力;三、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文化是唯一的,也是不可竞争的。

一个天朝,一个天子,一种政治文化,这三个因素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一元性。而这样一个政治一元主义到了近代,在建立了共和体制,实行分权共治的时候,就会与新的体制产生紧张关系,使共治、共和的体制慢慢地回到“一”上面来。共和就是由多种力量来分治、来共治。中国古代的传统强调的是“一”,“一”与“多”的紧张关系是导致共和体制蜕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最后,从晚清以来,在中国有关民主的讨论虽然比较多,但是民主从西方到了中国以后,它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产生了亲缘性的文化反应。这种反应可以说让西方的民主概念到了中国以后慢慢地民粹化了,变成了民粹主义民主, populism。而西方民主主义中的分权、自由、宪政等被人民主权的口号,或者说民粹主义的传统消解了。所以说,虽然晚清以来关于民主的讨论很多,看起来也比较丰富,但是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带有很浓的民本主义色彩,或者说将西方的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民本主义揉合到一起,形成了一种现代版的民粹主义民主。以这样一种民主观为基础,要想建立一种共和体制,或者说让共和体制长期存在,恐怕就变得非常困难。

最后,我想说的是评价一个体制的运行与变化,不能只从抽象的原则或价值出发,更要揭示导致体制变化背后的缘由,评判体制运行的实际效果。谢谢大家。

评论人 1:柯丽莎(哈佛大学)

王笛的论文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软实力运用的有趣故事,就是政府权力怎样扩张到民众日常生活、扩张到娱乐和消遣领域中去。你讲了一个关于成都的很有意思的故事,而我觉得同样有意思的是,向前推移到 1930 年代初期和中期,你所描述的那种制度化进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对民国时期做法的一种调适。我认为有一点很吸引人,就是茶馆从业人员大多是茶馆行会的成员,政府不会针对个人采取行动,而更倾向于和行会打交道,这是直接来自民国时期的一种行为模式。

我想我的问题是,我仍然很想进一步了解为什么成都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你已经指出成都解放的时间晚于全国其他地区,但是在娱乐和文化方面,成都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你的这一论述是

很有说服力的,即 1950 年到 1956 年的变化或转型,确实模糊了宣传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在某些意义上甚至合二为一了。现在我的问题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否真有可能把国家对制度的解释和实施方式强加于人——这些制度是用于具有不同利益取向的人群、而不是国家机构之上的。所以我想问的是,茶馆艺人是否真有可能符合党或政府想要传达的指令和价值,抑或让这些专业艺人把茶馆当作党的军事组织或特别支部更有效呢?你的论文还指出,从文化环境的转型和变化以及针对茶馆和艺人的改造来看,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例如作为非意图后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的失业者再就业问题和新出现的性别失衡问题——我认为这方面的论述是极具说服力的。

更宽泛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未能有效地完成任务,因为我从你的论文里看到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你谈到回乡的人们后来又返回城市,那么我推测是不是有更强大的茶文化和演唱俚俗歌曲的文化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乡村地区。你能否谈一谈 1956 年之后这种文化是如何演变的,它是完全消失了,抑或这种茶文化——至少是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以某种形式被在城市之外表演的戏班保存下来了?

对于孙教授的论文,我得向大家道歉,因为评论这个话题我有些力不从心。这是关于 1950 年代初作为一个秘密结社和反动会道门的一贯道的有趣故事。孙教授对 1951 年春阳所写的材料作了详尽的分析,我的问题是,你把这份材料称作政治话语,但是在我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份论战宣传材料。你把它和 19 世纪关于秘密结社和民间宗教的富有诗意的描述和分析做了对比,对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得出了很好的结论。可是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政治话语呢?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评价你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的张英誉的供词。你说供词是一种很难使用的材料,我对此深表赞同。我记得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掌握了被逮捕的天主教徒的所有供词,还记得她说把它们当作可以提供证据的历史材料来解读有多么困难。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来自 1950 年代初一贯道成员的其他历史证据,例如书信之类,但我

猜想找到这类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另外,我觉得关于秘密结社的讨论与日本人有关,也许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研究。共产党批判一贯道的焦点在于其成员跟日本侵略军合作,可是真的很难判断谁通敌叛国、谁只是略有卷入。

以上是我的简短评论,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评论人 2:韩博天(特里尔大学)

这一次我的发言一定非常简短。在阅读 Neil 关于 1954 年宪法的研究提纲时,我产生了一些疑问。从比较视角得出结论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实际上你也涉及到了这一点——在时间轴线上和 1975 年或 1978 年比较,也许不会有你所说的那么大的收获;但 1982 年可能更有意义,因为针对 1982 年的宪法文本我们有一个相似的大讨论。二者之间也许存在有价值的联系或对比。另一件让我惊讶的事情是苏联的前辈们,我刚刚在网上发现 1936 年斯大林宪法讨论的整套文件,这部宪法是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蓝本。我认为认真考虑一下中国人如何看待、处理苏联前辈们的经验,对于扩大这项研究的影响力是非常有意义的。另一个问题也很重要,你在论文中已经谈到了,但我还是想问: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多的资料来源来拓宽对宪法讨论之背景的研究,超越狭隘的宪法讨论本身,把它和“百花齐放”运动联系起来。如果能找到这两场大辩论之间的联系,那就更有意思了。

关于闫小波教授的论文,我也简单提几个问题。对我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短暂存在的这两次共和体制都是革命的共和体制(revolutionary republicanism)吗?共和体制蜕变为专制体制——事实上这个问题在西方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真的有这么特别吗?对此我仍然持有异议。你在文中提到了托克维尔、阿伦特以及伯克关于任何革命都会蜕变为暴力的论述。暴力革命会产生暴力行为并最终以恐怖收场,这是常见的模式。我觉得也许可以结合其他革命,更多地强调其中的共同点,重申或者推进这些经典著作——或者哈佛大学的斯考切波(Theeda Skocpol)教授——关于“在不同革命经验中找到共同模式”的论述。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两次共和体制的过渡时期——就是 1912 年至 1914 年和 1949 年至 1953

年——如你所说是空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又非常有意思。1912 年到 1914 年的共和体制因为缺少有效的权威而有名无实。1949 年到 1953 年的共和体制则因为它只是一种策略而同样有名无实,当时共产党有太多后续工作要做——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共产党控制着后续工作,党的使命不会对一条不确定的道路开放,共和体制的选择其实并不存在。我读过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历史,我想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确定无疑的目标,它隐藏在暂时性的策略性让步之下,可最终的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统治。因此,这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让步,而不是一种开放的、未定的选择。这使得对这两个时期进行比较变得非常困难。

#### 自由讨论

裴宜理:我想问王笛教授一个关于袍哥的问题,在 50 年代对茶馆展开批判时,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说它们(茶馆)仍具有袍哥的特点?这究竟是一种修辞,还是真的对袍哥有一种不安全感,就像对一贯道那样?对于一贯道,你可以说是政府把它推到了这个位置,但无论如何,正如李世愉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在人民共和国初期二者之间毕竟是充满敌意的。我正在研究红帮,在安源它是哥老会的一部分,哥老会又在很多方面与袍哥很相似。1950 年、1951 年发生过叛乱,当然是小规模,但是很显然,曾经动员工人结拜兄弟的那些矿区领头人在 50 年代再度激活了这些关系网络,直到 1954 年前后才停息。我想知道,在你研究的案例中,茶馆和犯罪分子之间仍然有联系吗,抑或这只是国家权力渗透的一种藉口?

王笛:我觉得政府是真的很担心他们的活动,共产党对袍哥的忧虑似乎超过了一贯道,因为加入袍哥的比例非常高。据估计,一度有 60% 至 70% 的成年男性加入了袍哥组织,国民党统治时期曾试图加以控制,但从未取得成功。共产党一开始就摧毁了这个组织,但他们仍然担心有一天它会——也许是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这种担心甚至一直延续到后毛泽东时代,有些地区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不是袍哥复苏,但和袍哥组织很相似——这让共产党深感忧虑。所以在 1950 年代,虽然袍哥组织已经被摧毁了,但组织

是可以重建的。事实上,如你所提到的,我的下一本书将会探讨从 17 世纪直到 1950 年代初的袍哥历史,探讨袍哥的兴衰浮沉。

萨克斯顿:我对这组论文有一些想法,我来谈谈自己的观点。我想我们需要回过头去梳理一下,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国家对城乡差别的管理,那么共产党——像任何其他政府,或者说革命后即将建立的政府一样——需要去创造一种文化,以便说服农民、工人和其他群体相信自己在政治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大家知道,确定这些人的类别和身份,所谓一席之地,就是要让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如果他们努力工作、行为正确,就能在体系内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流动和保障。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共产党之前历届政权的职责所在。

但是,我们首先得知道确定身份和位置的那些人是谁,所以我很想知道文化局里面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自己有没有文化,或者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文化,我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奇。与此同时,另一个让我好奇的问题是,这个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执行,或者它是否被过度执行了,这又把我们引向了对强制和恐怖问题的宏观思考。我们可以考察权力中枢发动的各种运动,还可以对政治气候和政治体制作进一步的探讨,它越来越威胁到地方社会稳定,并削弱了这些机构推行政令的目标或能力。

王笛:非常好的问题。文化局的工作人员是什么人?他们大多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或者说其中一部分——是加入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来到这里任职,但对当地文化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全都是外地人而非当地人,因为地下党从不信任当地人,所以只能从外地输入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不关心当地的传统或娱乐,只考虑如何执行党的政策。

张济顺: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请教王笛教授,你说到政府对大众娱乐进行控制和改革,这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国家行为,各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那么成都和这些地方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地方性的因素?与此相关,地方文化的特性是被消灭了,还是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了?另一个问题是请教 Neil 教授的,你提到当时对宪法的各种误解,把这些说法都翻译成不同的 law,可是“法”字在中文

里面的意思很复杂,不光是 law,它有很多很多的解释,特别是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way。比如说“戏法”,中文里是一种表演的方式和秘诀,变戏法,如果把它当成一种 law,一种人人遵守的规则,那戏法就没法变了。再比如“死法”,如果它是指刑法里如何处死犯人的规定,有枪决,有活埋,还有处决李大钊的绞刑,现在还有打针,这个可以翻成 law,但是另外的死法就不能称为 law 了。

王笛:华东师大的姜进教授也研究地方文化的问题,她研究上海,我研究成都,我们的结论有一些不同。姜教授强调,一些地方文化,比如越剧,经过共产党的改造后,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反而有更多的观众了。可是在成都,除了少量的大众文化形式,比如川戏,能够被改造进入到社会主义娱乐体系,得到发展之外,大多数的传统娱乐都消失了。全国性的剧目,在成都大多数都消失了,这个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不太一样。[张济顺:这个和地方性有关吗?]全国各地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就成都而言,我更多地看到了抵抗,政府一再要改造、取缔,但一直有抵抗,例如打围鼓,五十年代初基本取缔了,但到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仍然悄悄地出现。[张济顺:上海的评弹在五十年代也被改造了,可它也仍然存在,它会加上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讲社会主义的内容,可是它仍然存在。]对,不断的打击,不断的重新出现,文化的生命力和延续性非常强大。共产党用这么大的力量要去摧毁传统,可是到最后传统仍然存在。

戴茂功:我同意张教授的观点,我只是介绍当时普通民众对宪法的一些误解。我认为你说得很对,没有什么要辩解的。

孙江:我用中文来回答吧。你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资料方面的。我研究这个问题已经 20 多年了,看了很多很多的档案。我比较了这些关于民间宗教的官方文本,这些文本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一个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民间宗教,另一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民间宗教。它们的语言和文本的结构是一样的,回到历史情境中来,实际上它包含了中国社会的秘密。我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三本书,想要对西欧的市民结社和中国的结社进行比较,比较它们的上与下的关系,我想从中摸索出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式。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张英誉的供词,一个很巧的机会让我

碰到了 50 年代镇压一贯道的这样一批资料,这些资料都录入我的电脑里面了,有 15 万字。我也知道这些资料是不完全可靠的,也在思考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样去解读它。我会把它和别的供词进行比较,这样大致可以确定它所说的事情是否可信。另外会去仔细分析其中的细节,例如,在阶级斗争的巨大压力下,一个年轻人能够去揭发自己的母亲,可是这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很快就要被处死了,却天天在想念自己的母亲,供词里写了很多这样的细节。有很多复杂的内容我没有时间一一介绍,但从各种细节综合判断,我认为这份供词基本上是可信的。

间小波:Heilmann 教授刚才讲到其他地方也有很多革命。我没有把中国的革命和西方的革命拿来做一个比较,如果要比较的话,我想中国革命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地方。我前面讲到,中国革命有一种很强烈的一元化的色彩,而西方革命则相对比较多元化。中国的这两次革命,虽然在之前有一些舆论去讨论民主、共和、选举,但这些讨论都是比较泡沫化的,很容易破灭。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这样一种民主的思想资源,也没有像古希腊那样的民主实践,所以中国在革命之前关于民主的讨论是泡沫化的,讨论的品质是比较低的。另外就是 1911 年革命和 1949 年革命进行比较是否合适的问题。我想从后果来讲,两次革命之后都没有建立一个集权政体,而是建立了共和体制,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但是这两次革命又有很大的差别,第一次革命后的治理绩效很差,而共产党的治理绩效是很好的。除此之外还有,1911 年革命之后是三种政治力量,就是南京的、袁世凯的、清朝的,三种力量之间有一种均势,三方其实都不愿意谈,但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去谈,最终通过和谈建立了一个共和体制。那么 1949 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1949 年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跑了,它有能力独自建立政府,但当时有一个舆论的压力,因为共产党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要搞民主、要搞共和,这样的宣传使很多老百姓去拥护共产党。所以 1949 年的时候共产党不是不能建立一个一党的政府,而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去和非中共的力量进行协商、讨论。但到了 1954 年的时候,共产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它自主地设计了一个五四宪法,而其他力

量、其他元素的制约和平衡作用就越来越小了。在这一点上,两次革命也是不一样的。

温奈良:问 Neil 一个小问题,你能不能谈谈这次宪法讨论的目的是什么?从 1955 年到 1957 年发生过许多抗争事件,其中不少使用了宪法中的语言,例如社会保障权等。所以很显然,这部宪法的部分内容被用作了抗争手段,既然规定这些权利的初衷不是为了变成抗争工具,那么我想知道宪法讨论的议程是什么,通过宪法讨论试图教给民众哪些东西?

戴茂功:我知道这很令人沮丧,部分是因为上海档案馆——也许其他档案馆同样如此——的开放程度越来越低,甚至我在 2004、2005 年能够看到的一些材料现在也看不到了。我们能看到关于宪法本身的全部文件,但是看不到多少官方指示,而这正是我们研究这场运动所需要的。还有苏联的问题,就我的理解,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想要一部宪法。许多中央领导人反对制定宪法的理由基本上如出一辙:为什么要告诉人民他们拥有显然不能实现的权利呢?所以说到意图问题,说到他们想从中得到什么,确实很令人困惑。[温奈良:如果他们批判人们对宪法的误解,你能告诉我在批判者眼中什么是正确的解释吗?]假定他们知道宪法的真正含义,它是中央政府颁布的赋予人民权利的文件。我认为政府是想通过宪法来获得合法性,既针对上层阶级,但更多的是针对工人阶级。所以劳动权,在特定时间停止劳动的权利、休假的权利,工人们非常在乎这些。党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说劳动权对工人阶级非常有利,但是也为资本家提供了好处,比如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包含在劳动权里面。每个人都能从劳动权中获益,这也许是为了安抚民众,但也有可能惹恼他们。因此,这份文件真像是把不同观点揉在一起的大杂烩,如果它仅仅是一种获得合法性的手段,如果我们想要揭示其中的奥秘,你是不会需要这些混杂不清的信息的,所以确实令人困惑。冯筱才认为这一切都是政治和政治控制,只是为了让人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获得相关的情报,从而更轻易地击垮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让数十万人把他们对宪法的各种建议写下来就变得很有意义了。我不知道这些建议是否用上了,也许它们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用上了。

问：一贯道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我现在正在研究海外华人，我发现一贯道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他们建起很大的建筑，而且有各种训练计划。我的问题是，据说当时在北京就有 20 万的一贯道成员，这个数字可信吗？共产党几乎把每个道场的负责人全部抓起来，对一贯道进行严厉镇压，是不是因为一贯道有非常强大的网络、强大的组织能力？

孙江：我认为当时一贯道没有那么大的规模，这个数字中虚假的成分比较大。你看大跃进就知道，地方政府不断地报数字，但未必可信。比如说山西省，在 10 天之内怎么会挖出 10 万人呢，这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这些数字可以说是假的，是把他们认为是敌对阶级的人都放到一贯道这个框子里面来进行镇压。事实上一贯道是没有能力去反对共产党的，所谓反革命、反共产党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加上去的。另一个，我们说的是五十年代，这和朝鲜战争有关系，当时共产党有一些走向共和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被朝鲜战争给灭了，其中的一点就是镇压反革命。我在文章里提到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但很多中国学者对这本书的读法是错的，他们认为是要用中国的原则来看中国的历史，日本人的读法是把它当作一个东方主义批判的文本，我觉得都是错的。我通过研究美国的中国研究、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国的中国研究，提出要实现一个认识论的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没有这种转变，中国研究的出路堪忧。

### 第三场：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变与常

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再现圣约翰？美国大学在上海，1879—2012

非常感谢 Perry 教授支持这样一次讨论会，也非常感谢李里峰教授盛情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在准备论文的过程当中可谓煞费苦心，但是结果呢，可能呈现的只是我自己一些非常粗浅的考虑。要跨越 1949 年的鸿沟，特别是还要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来看问题，对我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尤其是上午听了咱们杨奎松教授的宏论，听完他的发言、看过他的文章以后，我不断地在想，我做这个干什么呢？但我还是想把我的一点考虑，作为历史和现实的沟通，来说一点不成熟

的看法，可能引起大家的批评。

我做的是这样一个题目，讲了两所大学，一所是 1879 到 1952 年在上海办了 73 年的美国教会大学，叫圣约翰(St. John's)，很有名。顺便说明，现在纽约也有一个 St. John's，跟这个大学没有任何渊源关系。另一所学校现在还在建设过程当中，就是上海的 NYU Shanghai，或者 Shanghai NYU，它是 2012 年正式被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建在浦东的陆家嘴，现在还没有造好，明年大概能造好。今年已经开始招生，将录取 300 个学生，学生们暂时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新校区学习。

我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确实觉得，上一代的研究和现在一些比较好的研究都觉得，1949 年的这个鸿沟应该跨过去。但是能不能跨过去，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办法。第一个，我理解的“跨过去”，可能是在新旧中国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有交叉，有延续。比如说我讲的这两个学校，就是发生在中美教育交流完全断绝之后产生的学校，一个是之前有教育交流，一个是完全断绝之后再出现的。所以在断绝当中是不是有它的延续性呢，可能这是考虑能否跨越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今天更想从第二个方面来谈，就是处在两个不同时段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表象之间，有没有相互呼应、相互观照的部分？

我先来讲一个梦。现在“中国梦”的说法非常时髦，但是我讲的是美国梦，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梦。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上海纽约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有一句非常醒目的话：“让世界成为你们的课堂”。大家看了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广告语。在它建立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跑到这样的地方去扩张？是赚钱吗？或者说是显示你纽约大学与众不同吗？也许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但肯定不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再给大家解释。它真的是有一个全球网络支撑的。上海纽约大学是继曼哈顿校园和阿布扎比校园之后的第三个门户校园，也就是说它已经有一个实体在那儿支撑了。而一个世纪以前的圣约翰大学，大家都知道，当时是基督教征服世界的一个梦想。而且它把这个梦想付诸在很多方面，包括传教，包括教会大学，包括医院，包括很多福利事业、慈善机构。传教士总是想把教会大学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而上海的圣约翰

大学又是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的大本营。

这样两个美国梦,它们都想在上海这座城市实现,它们都聚焦了上海,但是有不同的遭遇。上海这座城市,当时铸就了圣约翰的辉煌,造就了它前期非常辉煌的历史。当然最后它衰落了,最后在毛时代被取缔了,留下了很多难堪和苦涩的记忆。它前期的辉煌时期,恰恰得益于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得益于上海租界,但是后期它也跟其他教会大学一样受到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抗议运动不断,也受到了校园政治化的冲击,所以它也慢慢地衰落下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难堪的记忆,就是在 1925 年的“五卅”运动中,因为有 500 多名师生抗议校方不让在校园里悬挂中国国旗,来悼念运动中被枪杀的中国人,他们愤然脱离了圣约翰,另外筹建了一个光华大学,就离圣约翰校园不远。这两所大学的抗衡,使得圣约翰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虽然还照样能收到很好的学生,但毕竟有一所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和它抗衡。这是一个难堪。

现在很多研究都认为,“五卅”运动中的国旗事件是它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当然我不认为完全是这个因素。当时离开的不只是一批学生,不像 1905 年复旦从震旦大学脱离的时候那样,完全是一批学生。当时离开圣约翰的不光是一批学生,而是有国文部主任孟宪成以及钱基博这样知名教授率领,孟宪成后来成为了华东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也是在 1949 年到 1951 年间华东教育部的部长。圣约翰大学在那个时候,脱离了和美国教会的经济关系之后,要打很多次的报告,向贡献者要求经费。所以对上海来说,对圣约翰的独特的难堪和苦涩的记忆,也许和其他的教会大学不完全类似。

上海纽约大学则完全不一样。它既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又得到了建筑下面的这块地——谁都知道这是一块寸土寸金的宝地,浦东陆家嘴——和巨额的开办经费,造房子的经费全部都是由上海市政府和浦东新区政府给予支持。更重要的是,她还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支持。前面的刘延东、韩正不用说了,就是在去年的 12 月 5 号,习近平召开了一次外国在中国工作的专家会,一共请了 20 人,上海纽约大学的执行副校长也荣幸地受到了接见。这个在中国意味这什

么,大家都很清楚。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上海纽约大学比圣约翰大学有这么多有益的条件,那么他们自认为发源于纽约这样一个世界伟大理念之都的梦想,是否就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变成现实呢?我想说,它可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本土化,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说民族主义浪潮使当时美国传教士的全球梦想屡遭挫败的话,那么今天上海纽约大学面临的本土化问题,比之当年的民族主义涉及更广,也更有挑战性。

本土化问题在圣约翰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教育主权。圣约翰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吃亏的。在它 73 年的办学历史当中,有 68 年没有在中国注册,也就是说它在中国是一个黑户,它的文凭中国政府不会承认的。如果去政府里面就职,圣约翰大学的文凭是不行的,这个当然造成了很多问题。而上海纽约大学一开始就向中国政府注了册,它是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独立大学。它的法律问题应该说解决了,但是在法律的解释方面,中美双方各执一词。NYU Shanghai 是纽约大学的解释,就是说它是纽约大学在美国以外的一个校园,一个 campus,上海只是一个办学地点。而中国政府说, No, 你是 Shanghai NYU, 你就是一个法律概念,你就是一个教育主权的概念。因此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法律解释的歧义。目前是以中国人的智慧,完成了在中国的合法注册。但是在法律上的注册完成以后,从课表开始它还有很多内在的问题,特别是在文化的本土化方面,它到底是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学校,还是一个中国化的美国学校,是很成问题的。

在近代中国,就像全盘西化的不可能一样,美国人在中国办学非本土化也实在是一个梦想。圣约翰最终衰败了,它到底衰在哪里,败在哪里,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它被毛时代取缔了,如果不取缔,它还可以办下去,还可以办得很好。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本土化的问题。她培养了一代一代的知识精英,这些人不可谓不懂得美国文化,有些人可以说非常非常崇拜美国,但他们骨子里还是中国人,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就比如说被毛时代所斥责的那些反动派,那些圣约翰的校友,比如宋子文、严家淦,我想要不是他们这些人一直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一个中国,恐怕不太可能。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想在圣约翰本土化的问题上,它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抗争。

在当代,本土化的问题仍然很严峻。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殖民主义时代到现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中国人全球流转的咨询的获得变得十分便捷,西方和美国知识的获得不再是少数人所垄断的。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窘境也前所未有的。比如说像纽约大学所称,我们要把美国博雅教育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精华结合起来,给学生最佳的教育体制。可是,美国的博雅教育体系清晰明了,而什么叫做中国教育精华还说不清楚。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崇美心态和思潮卷土重来,而且比近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强势的美国文化就像磁场一样吸引着中国青年,犹如章鱼的触角伸向中国人日常的生活状态,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和教育就显得僵化和迷茫。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被崇拜者的纽约大学,它是否应该首先引导学生——因为按照协议它要招51%的中国学生——去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这样来引导学生,形成他们批判性思维的第一课。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还面临着非常堪忧的教育腐败的问题。拜金主义和权力腐败不但扼杀着中国文化的生机,而且教育也难免受到波及。纽约大学才刚刚办起来,我们收到的条子就无数,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让他们把自己的三亲六故收到去,仅这一点我想就够上海纽约大学对付一阵子了。当然我谈到上海纽约大学本土化时候,也包含了对它捍卫教育本质、坚守大学使命的期待,不见得本土化就把本土所有的东西都包含进去。

我还想讲一下警惕美国化,因为当今全球化被等同于美国化。当年传教士的努力也好,近代美国也好,确实对近代普世价值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全球扩张,随着美国的发达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应该说当前的全球化等于美国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谈到美国化的时候,我想,警惕美国化就是一个既苛刻又必要的提醒。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那么上海纽约大学这样一所美国学校,它在美国创造的价值和经验面前,最多只是一个守成者,而不是一个创业者。如果坚持美国化,那它建起来的新

大厦就还是一个旧的大厦,不过就是添砖加瓦而已。这样的话,这个纽约大学就在曼哈顿办办好了,不要到全球去,如果只是再去办几个美国大学,有什么意思?

最后,我想回到我们跨越的问题上。我觉得普世价值还是我们当年圣约翰留下的东西,我想它还是有再现和超越的可能。圣约翰有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这和它在校长卜舛济主政时确立的自由教育的理念是分不开的。这个教育模式有几点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倡导文理兼容,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第二个是以独立教育为宗旨,以立国富民为前提,以克己自制为本意;最后就是一个大学的本质,或者说教育的使命,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达国家和社会之进步和昌盛。我认为自由教育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理念,它是卜舛济从古代希腊文明当中吸取精华,又融合了近代基督教以德为先的原则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大学被赶走,美国教育的通识教育、通才教育都被否定,作为崇美思想遭到批判。在当下,尤其是在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通识教育不断以各种形式被表达,像北大的元培班、复旦的复旦学院等等。但总的看来,现在中国政府只想引进制度,不想引进它的教育理念,只关注美国大学怎么管才更好。

我认为,如果说圣约翰有再现的可能,那就是说它模式中的这些普世价值具有传世和指导的意义,能够在今天再现。今天去再现它,面临的又是一个网络时代,一个信息时代。所以我想上海纽约大学有一种责任,就是把这样一种普世性价值在今天的时代弘扬开来。我想最重要的是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上海纽约大学作为一个有实体的教育组织网络——因为她有三个很实实在在的实体校园——怎么样以鲜活的人文精神和深邃的智慧去造就完整意义的人,而不是培养很多高技术的人,而扼杀了人的灵魂和文化。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温奈良(Nara Dillon,哈佛大学):建设中国福利国家,1943—1962:革命变迁中的制度延续?

首先,我想感谢李教授和Perry教授的邀请,给了我在这里报告的机会。我还得向大家表达歉意,因为我感觉自己不在状态,到这场讨论开始的时候才把报告的几个要点写下来,但我会尽量用

比较恰当的方式把我的观点呈献给大家。我想我这篇文章其实更适合面向其他的政治学家而不是在座各位,大家显然都是非常关注历史因素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读研究生时学到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学路径(暗指历史制度主义),一直在遵循这种理解特定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的模型,并对它的局限性作过很多思考。我在这里要做的部分工作,是试图应用从其他历史案例中提炼出来的这个模型,把它提升到一个建设性的高度并略作修正,用于探讨革命对历史变迁的影响——历史变迁是如此丰富,我认为应该将其作为理论化的基础。大家得稍稍忍耐一下,因为我相信在座各位对这个理论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不过我会很快跳过去。

这一流派的基本观点是,制度是非常持久的社会结构,以重要的方式形塑政治。制度是很难改变的,制度变迁通常只能以渐进的、增量的方式发生——我在文中试图描述这种制度变迁——除非是在一些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往往是社会遇到了强大的外部冲击,危机如此严峻,以至于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忽略它。所以,像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黑死病的大规模蔓延,通常认为这样的危机会促使制度发生变迁。当然,革命也是这些关键节点中的一种。我对这种模型局限性的思考,得益于阅读和教授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Acemoglu & Robinson 的《国家何以失败:权力、财富和贫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2012),这本书最近在美国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作者在书中把这种历史变迁的解释模式运用到了极致。这本书本质上要解释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革命或历史变迁。但在尝试解释经济发展时,他们提炼出了这种非常强大和持久的制度模型,他们声称,我们大多数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存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了,每次它们被摧毁之后,我们都会回到原处,创造出本质上相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该书是少数几本探讨了不同革命的政治学著作之一,这也是我对它如此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一学派的大部分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欧和北美社会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社会都是已经高度制度化了的。

这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石器时代至今的

全部历史进行了考察,其中当然也包括许多场革命。但是,他们对革命的描述有一点让我感到意外,就是他们笔下的大多数革命没有对制度变革产生任何基础性的影响。尽管他们的著作中涵盖了许多革命,但只有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产生了持久性、基础性、转型性的影响。书中还提到了明治维新,将其作为转型性变化的一个例子,尽管他们不把它称为革命。当然,对于研究中国革命的人来说,发现 1688 年比 1949 年更重要是很具有震撼力的。我在英国呆了整整一年,在那里研究英国革命,现在我不太能赞同这种看法。他们对英国革命的描述令我印象深刻,在诸多的革命只有英国革命得到了很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但书中对英国革命的历史叙述是非同寻常的。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把 1688 年革命视为所有革命中最根本的一场革命,因为它带来了多元民主,而且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引发了工业革命。所以对对他们来说,英国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

但是他们认为,引发多元民主和工业革命的关键一环其实并非 1688 年革命,亦不是此前发生的任何其他政治变迁,而是 1588 年伊丽莎白一世所做的政治妥协——她放弃了王室对权力的垄断,接受议会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说实话,尽管我在英国研修了一年,对这件事却未曾耳闻。所以在他们看来,1588 年的政治妥协才是最重要的变革,他们称之为增量变革(incremental change),对一百年、甚至几百年后的历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读这本书使我开始质疑自己在研究生阶段学到并一直在使用的历史制度主义,我开始思考,革命性的变迁究竟是否可能,制度性的变迁是否可能,它使我对自己的整套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

回到我对中国福利国家发展的研究,我开始质疑这种很有局限性的变迁模型。在思考中国福利国家的发展时,我认为 Mark Frazier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令人信服的描述,他的描述在很多方面与历史制度主义所提供的变迁模型相契合。他挑出第二次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中国国家发展的关键性转折点,他说这就是 Acemoglu、Robinson 及其他学者所称的关键节点,实际上比 1949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更加重要。一直以来,我都试图重新思考对中国福利国

家发展的这种描述,思考在中国福利国家发展的渐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差异、各种断裂。我认为,在 Frazier 观察到的各种延续性中,大型企业——特别是当时的国有企业——体现得最为明显,一些企业集团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制度化的延续:从私有企业的福利资产到国民党的工人福利计划,再到共产党的工会组织。我认为,如果对这一时期更多的企业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在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它们更多地经历了断裂而不是延续。

首先需要说明,私人企业福利和职工福利计划都是非常小规模。所以我发现,这时期一个主要的制度性断裂,就体现在 1951 年施行的劳动保险计划的规模上。对于参加 1951 年或后来整个五十年代劳动保险计划的大部分公司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计划,其规模之大,足以让人感受到它和此前福利制度之间的断裂。

我认为造成断裂的另一个主要根源,在于这些福利计划本身的性质。我对这些计划的部分内容进行比较,发现这些计划在所提供福利的类型上是相当不同的,在计划管理上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制度后果。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工人福利计划完全下放到了企业层面。劳动保险的福利制度——劳动保险条例、参保资格的标准等——都是在北京制定的,它们需要一个更正式的行政机构来执行,特别是因为劳动保险计划为这些企业里符合条件的工人提供了终身的福利保障。我之所以认为这些计划在本质上有不同,是因为劳动保险计划的资金来自于强制性的工资税,而不是在企业层面确定的自愿捐款。1951 年保险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最初的劳动保险条例让工会在管理、执行劳动保险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我认为,1951 年的劳动保险计划其实是某种形式的断裂,是一种全新的变革。它使工会在工厂内拥有比 1949 年以前更大的权力,劳动保险和失业救济使工会在工厂外的福利供给中也承担了主要角色。1950 年代初,工会成为了中国城市最大的福利提供者。

我认为,中国福利国家发展中呈现的那种延续性,实际上是 1950 年代所尝试的许多劳动改革失败的产物。由于时间限制,我只想简单地谈谈 1951 年由工会提供(福利)的那次尝试的失败。如果考察这一时期的开端和终结,我认为它只是

1950 年代造就这种延续性的诸多制度性失败中的一个。在我看来,赋予工会在工厂内的部分自主权和在工厂外的更大自主权所产生的非意图后果,是它引起了对工会自主领导权的忧虑,担心工会变成共产党自身的竞争对手。很显然,在这些国有企业内部,他们试图把控制经济放在首位,但我想对党来说还有更多的担忧。

因此,1950 年代这些改革的命运,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将工会重置于党的直接控制之下的努力,而事实证明这很困难。这些新福利计划确立不久,就迈出了控制工会的第一步。1951 年底,福利计划的设计师、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被清洗,他试图提升工会的自主性或者说发展工团主义,但其政治错误之一是想重新获得对工会的控制权。这里是共产党试图用不同方式重新控制工会的几个例子。1953 年发生了针对工人和失业人员的运动,让他们更努力地工作,而不要太关注自己的福利。1955 年,工会向失业人员发放救济的做法完全停止,工会作为福利提供者的角色从此被局限在工厂内部。1957 年罢工浪潮之后开展了反右运动,整个工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重大的重组和改革,使工会重新分散到企业层面,尤其是对主要储备资金的控制也从根本上降到企业层面。我认为到 1958 年时,已经倒退到了大家前面看到的工厂福利模式,但它是由于 1951 年让工会在福利供给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最初改革的失败所导致的。

所以我从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种失败和其他因素一样,也是共产主义革命中延续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我试图弄清楚为什么实施劳动保险是 1950 年代不太成功的改革之一,我把它和共产党在 1950 年代初取缔私人慈善的另一项制度化变革进行比较,想要探寻这样一个问题:与我在这篇论文中谈到的那些失败的改革相比,成功的制度化变革包括那些要素?我总结出三个要素,它们都是制度化变革中的政治要素: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必须尽可能让制度的受益者参与运动;必须把原来的制度或即将被改变的制度之执行者的反对力量尽可能降到最低,防止他们对改革运动采取任何有效的反抗。最后我认为,在这种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是和正当性密切相关的,既要削弱旧制度的合法性,

又要提升新制度的合法性。在我看来,和 1950 年代许多失败的福利改革相比,这就是那些成功的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我尝试对 1940 年代与 1950 年代变革过程之间的差异做一些理论分析,我认为和其他的关键节点相比,革命这样的关键节点应该得到更严肃的对待。我还认为这种成功的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性的变迁:它涉及动员,涉及非常巧妙的和反对者打交道的策略,还涉及合法性。在对不同时期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应该更重视这些革命的作用,和大萧条、大瘟疫之类导致社会原子化的危机相比,它们更像是引发根本性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如果把中国革命视为这类革命动员的一个例子,我们将会看到革命过程中各种有效的制度变迁形式。但是令人惊讶的一点是——我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和今天报告的多篇论文都表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各种相似之处。在我看来,1940、1950 年代两党在政治取向及具体政策上的相似性、延续性不是由于制度产生的,而恰恰是由于两党没有让这些制度过多地束缚自己的政策。但是,两党各自开展的政治斗争中存在某种政治连续性,又的确在创造出相似的制度——分别在 1949 年之前和 1949 年之后、在大陆和台湾。所以我试图阐明,与其说是制度催生了相同的政治,不如说是政治创造了相同的制度。我不太确定该如何解释 1940 年代的国民党和 1950 年代初的共产党之间的高度相似性,那些政治相似性为什么会存在,我希望比我更渊博的其他学者能够给出某种解释。不过我的确认为,这些相似性的根源还是存在于当时的政治中,和其他社会相比,这一时期的政治是极端地非制度化或者低制度化的。

这就是我试图给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我还剩下多少时间?两分钟?那接下来我会回到结论部分,谈一谈为什么共产革命是如此重要,可以称为一个关键节点。首先我认为它比外部冲击之类的其他节点更能引发制度变迁,所以也更为重要,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另一点是关于改革失败的。Acemoglu 和 Robinson 等人之所以在 20 世纪的革命中看到了巨大的延续性,而在 18 世纪的革命中看到了根本性的变迁,我想原因之一也许就和这种“失败”观有关。因为事实上 18

世纪的革命并没有打算做太多事情,他们也许只想在体制内部对政治制度稍做些改变,特别是在英国的例子中,他们甚至为国王保留了一席之地;但也许正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情并不多,反而会产生更长远的影响。我对此不太确定。

但是,我确实赞同对 20 世纪革命的这种看法,即这些革命政党,特别是共产主义革命政党,希望能在旦夕之间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足够的政治动员,也没有多少战略和预见可以帮助他们改造一切、创造一切。所以,或许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样一种延续性:革命的目标总是如此雄心勃勃,可事实上这些目标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够变成现实。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延续、延续,而很少有人去讨论变迁。刚才说到镇压一贯道,说到取缔民间娱乐,这些努力都是为了阻止人们违背党的意愿行事,但这种做法的成效都是暂时的,所以令人关注的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些富有成效的变革,也许在许多方面其实代表了一种失败,荡涤一切旧事物的宏图大志的失败。我就讲到这里吧。

李里峰(南京大学):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中国的政治运作

大家下午好,我很高兴、很荣幸能够坐在这里。在报告之前,我想先表达我对哈佛燕京学社的诚挚谢意,感谢它为我提供了组织这次工作坊的宝贵机会,感谢 Perry 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感谢在座每一位教授的参与,感谢你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演和点评。特别要感谢杨奎松教授,他能参加这次会议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昨天夜里 11 点才到这里,而明天早上 8 点又要乘飞机离开,感谢你的支持。

我想既然时间有限,我就尽量长话短说。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中国的政治运作”,它是以该领域的众多文献以及我本人关于 1940 年代后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早期研究为基础的。大家会注意到,标题中耍了个小花招,在“群众运动”中,“运动”是作为名词使用的,指大规模的集体活动;而在“运动群众”中,“运动”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是动员的意思。通过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这一对概念,我想对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运作略作探讨。我在这里所谈的群众运动,是指由中国共

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动员发起,各级组织和干部操作运行,各地基层民众广泛参与的全国性、大规模政治运动。革命时期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大概是从194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后期,后革命时期则是指1980年代至今的当代中国。

我们首先看一看薄一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副总理,也是薄熙来的父亲——对群众运动的评论,他说:“我们党搞群众运动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战争环境里,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完成一些重大任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常常是很有效的,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建国初期广泛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变革。就成了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既然是搞群众运动,一点毛病不出,一点后遗症不留下,那是不大可能的。在有几亿人口的农村,把合作化当作政治运动来搞,难免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一旦大规模地搞起来,有些行动就难以控制住了。即使及时发现了某些偏差,但在运动的惯性冲力面前,想纠正也很难完全纠正。”应该说,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对群众运动所做的非常中肯且富有启发性的评价。

说到“运动”,其实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事实上,西方学术界积累了一大批关于世界各地所谓“社会运动”的文献,这里只列举了一小部分我阅读过的文献,蒂利(Charles Tilly)也许是该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关于中国的群众运动,我们也有许多西方文献可以参考,例如,Gordon Bennett早在1976年就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运动》(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的著作。当然,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与西方的社会运动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简言之,西方学者关注的社会运动是自下而上的,亦即这种运动是由社会底层或边缘群体发动、旨在对抗执政当局的;而中国的群众运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是党和国家而不是群众发起了运动。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国的群众运动时,就有一个从“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标题。

在共产党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动员式的政治参与(mobilized participation)。美国学者伯恩斯

(John Burns)曾经指出,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中共发动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农村进行了广泛、深入和有效的政治动员,农民在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背景下实现了广泛的动员式政治参与。事实上,我们发现许多中国学者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例如,中山大学的郭正林说,从1949年到1979年,农村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政治卷入(political involvement),通过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将农民卷入到政治中,所以,其实是“卷入”而不是“参与”。他认为政治卷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治倾向,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二是工具主义,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政治需要;三是阶级斗争,基于阶级分层而不是平等的参与。再比如陶东明和陈明明提出的“倒参与”概念,或者说“被参与”——我们知道,“被……”的表达方式最近在中国非常流行。通过“倒参与”或“被参与”的概念,他们想要表达的是,毛时代的政治参与不是社会和公民从外部主动参与到政治系统中去,而是政治系统自我扩张而席卷了社会和公民。换句话说,不是公民参与政治,而是政治涵盖一切。

第二个特点是国家的在场。我说的是乡村地区,从帝制时代到人民共和国,不同时期的乡村精英虽然在名称、结构和特征上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垄断着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这使他们在乡村治理中处于无人可以替代的有利地位。这是一种线性的治理结构。但是在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中,党和国家可以通过工作组来直接面对乡村社会,基层干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而广大群众则被赋予了监督干部的权力,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制约,造就了党和国家的终极权威。我把它称之为三角治理结构。如幻灯片所示,这是线性治理结构,先是国家,然后是乡村精英,然后是乡村民众,在这一结构中,精英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在各种群众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类型的治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工作队,而不是干部或基层精英,通过工作队,党和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介入了乡村社会。

第三个特点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我们知道毛主席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事实上这句话是官方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里

的第一句话。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年,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施密特(Karl Schmitt)表达了和毛主席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他说:“如果要对政治领域作出界定,我们不得不诉诸一种终极的划分,就像在道德领域是善与恶、美学领域是美与丑、经济领域是利与害,政治领域的终极划分便是敌与友的划分。”敌与我、敌与友之间看似水火不容,却恰恰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在旧社会,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压迫着农民阶级;而在共产党缔造的新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须由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来证明。想像中的阶级敌人的长期存在,为党和国家在乡村社会进行民众动员和思想灌输提供了一种展示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人数比例极小的政治贱民群体,支撑起了从中央政权到乡村民众的庞大统治体系。

接下来我想更直接地探讨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模式(campaign—mode of governance),或者更确切地说,运动式的治理风格或政治风格(campaign—style of governance)。我刚刚提到,我前期的一项研究是关于 1940 年代后期的土改运动,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场运动,就是从 1950 到 1953 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这场运动的运作过程与土改几乎完全相同:工作队进村;检查村中阶级状况;通过个别访谈和集体开会等发动群众;寻找和培养积极分子;确定打击对象并对其开展诉苦、实施斗争;局部或全面的资源再分配;整理村支部、改造村政权;工作队离村。

如果可以,我想把这样一种政治运作模式称为“行政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近年来,金耀基、康晓光等人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或“政治行政化”)的概念,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政治格局,意思是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从而以“精英整合”的方式赋予统治权力以合法性。这种现象自 1960 年代在香港出现,1990 年代也在中国大陆出现。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rank Goodnow)在 1900 年对政治与行政的经典定义,我想说,毛时代所发生的情形恰恰是政治侵越行政,或者说行政政治化。古德诺说,政治和行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府功能,前者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后者则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中国共

产党发动的每一次群众运动都包含着相似的政治内容,例如资源的再分配、权力的调整、对基层精英的监控、对民众的动员等等,这些都有助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与日常的治理方式相比,这种治理模式或者说治理风格高度依赖于群众运动激起的非常规状态,可以称为“运动式治理”。在这种模式下,政治运作是非常规的、非连续的,社会治理无法由官僚组织自动实现,而有赖于党和国家的指导和干预。社会治理本来是一种行政功能(国家意志的执行),却只能通过政治功能(国家意志的表达)来实现。党和国家既要表达、又要执行自身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政治化了。在我看来,这种治理方式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很明显的。优点在于能够快速高效地实现国家意志,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政治,增强统治的合法性;缺点则在于统治成本过高,而且难以被常规化或制度化。

最后我想谈谈群众运动留给当代中国的历史遗产。毫无疑问,在毛主席去世和“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特别是 1989 年之后,中国群众运动的数量和重要性都大幅度下降了。但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发生过许多运动,我在这里列举了其中一部分。最近的一次就是刚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运动。就在几天前,在 201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关于在党内发起群众路线教育的讲话,要求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运动的基本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样的做法,显然延续了毛时代的政治运作风格。

所以,我想得出两个非常简短的结论。第一,借助群众运动,党和国家可以更有效、更便捷地实现民众动员和社会治理的目标,但治理成效却难以纳入常规化或制度化的轨道。由于群众运动削弱了政府的日常行政功能、增加了政府的统治成本,所以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产生了难以消解的矛盾。第二,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之间的延续性特征,以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当代中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的许多做法,可以追溯到革命年代或建国初期。所以,Heilmann 教授和 Perry 教授合编的那本《毛泽东的隐形之手》(Mao's invisible hand)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包括

群众运动这一遗产在内的那只隐形之手,也许仍然萦绕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谢谢。

评论人:王笛(德克萨斯 A&M 大学)

非常感谢李教授,我们时间不多,我的评论会尽量简短,这样可以留出提问的时间。我不得不说,这三个报告都很精彩,很有启发性,都围绕着跨越 1949 年分水岭这一主旨,从不同视角审视 1949 年之前和之后的历史。

张教授通过两个案例——圣约翰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考察了教育领域的变迁,我认为这是两个很适合结合起来考察的很好的案例,我们确实很想发现其中的异同。这篇论文也引发了很多问题,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也许非常困难。接下来我用中文来提问。读这篇论文,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共产党一方面想紧密控制,另一方面又把门打开,同意在上海设立这样一所学校。无论你想不想美国化,设立这所学校恐怕很难避免美国化的影响。我不明白,共产党现在为什么要把高级干部送到哈佛之类的地方去培训,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底线,但是把大批的干部送到美国,接受西方的影响,恐怕会对中国的制度产生很大的后果。回到在中国办学的问题,想想圣约翰,它实际上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在中国办这样的大学肯定会有很大影响。这里我觉得有一个两难困境,不知道党是怎么考虑的,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其次,张老师在最后提到普世价值的问题,我觉得你很强调这一点。你提到圣约翰的失败或者说胜利,又说现在我们要警惕美国化,如果遵循普世价值,我们的教育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问题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不太承认普世价值的,虽然也没有否认,可总是会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不搞西方的那一套,这个和我们理解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有矛盾的。那么普世价值能不能在中国发展下去,也希望张老师讲一讲。

Dillon 教授的论文使我大开眼界,我对这套理论和结构不是太熟悉,你把这些理论放到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认真探讨了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我想问的是,究竟什么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可能是什么、不可能是什么?你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变迁非常的困难,因为它不得不满足一些特定的需求。革命和市场化带来了变化、戏

剧性的变化,但是根据你的定义这些变化算不上真正的制度变迁。但我对你用来探讨跨越 1949 年前后的案例——中国福利体系——很感兴趣,什么是延续,什么是变化?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非常重要,但是根据你的结论,你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制度变迁。我没有具体的建议,但我愿意提醒你关注最近在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和你的研究主题正好是一样的,作者考察的案例是武汉一家企业的福利体系在 1949 年前后的演变过程。当时的一些政策,例如劳动保险和工会,在今天的福利体系中仍然存在,但是其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程度有多大,作者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对于最后这篇李教授的论文,我认为他对政治运动采用了一种真正宏观的视野。我们已经看到了共产党历史的两个篇章,它还会一章一章地写下去,总会有运动,总会有动员。你的工作非常出色,对这些政治运动的特征和影响做了很好的梳理,揭示出它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的。你的结论也很有启发性,提到今天仍然延续了毛时代的运动式治理。但是我可能有一点并不认同,我认为最近发生的运动与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有很大的差别,在我看来这种政治运动基本上被邓小平终结了,我想是在 1989 年之后,就看不到真正这种类型的群众动员了。所以希望你能告诉我这种延续性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今天共产党其实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群众动员和群众运动,而且试图控制和消除这类活动,即便对反日民族主义活动也是如此。我想知道,今天的领导者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使他们区别于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他们是如何看待动员、看待群众运动的。谢谢。

#### 自由讨论

问:我有一个问题问张老师。您提到上海纽约大学的建立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考量,我知道它在阿布扎比建立校区的时候,经费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的,非常优厚,所以钱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成立上海纽约大学最主要的动因在哪里?是美国方面更积极,还是上海更积极,抑或是双方共同促进的结果?

戴茂功:我在上海参观世博会的时候,突然意

识到自己置身于一场群众运动中,当时的情况让我很惊讶,国家在进行动员,甚至工作单位也做了动员工作,这确实让我想到了群众运动。我认为 SARS 动员也是这样一种运动,所以我的确看到了其中的连续性,这是群众运动的问题。不过,我的问题主要是提给 Nara 的。我一直在研究婚姻法和退伍军人政策,这些能算制度吗?我的意思是,这些政策或法规的颁布实施究竟算不算制度,或者就是政策而已?我想,我们或者新制度主义者在使用制度这个概念时往往是很含混的,但是中国政治的极端非制度化总是让我感到惊讶,把那些名不副实的制度称为制度有时候似乎不太慎重,它们完全达不到制度主义的基本要求。所以我知道,对于五十年代的劳动政策来说,是什么使它成为与政策相对的制度,或者说政策就是制度呢?

裴宜理:我向张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你提到民国时期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校长面临过“五卅”运动的挑战,一些老师离开了,但是没有提到现在的上海纽约大学是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纽约大学的老师前不久模仿哈佛大学,对校方的做法表示不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纽约大学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全球化,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一些学术的目标?老师的想法和校长的行政目标也许是不一致的。另外你提到要警惕美国化,那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创造一种中国式的社会科学?我是研究政治学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李老师和阎老师,因为他们都是政治学者。

张济顺:我也了解纽约大学一些教师对校长的不信任,阿布扎比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上海纽约大学其实在校内一直没有得到一致认可,但它最终还是启动了,这就是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建立这样一所学校,办学的动力是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它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在办学准备的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钱的问题。首先它是一个私立大学,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上海政府提供了这么多的支持,但它仍然是一个私立大学,而且在中国办学,51%的中国学生是不可以像在纽约一样收费的,而是按照降低了的标准收学费,每年 10 万元人民币。这个钱对中国学生来说当然是非常贵的,但它有各种各样的奖

学金,如果你真能考上这所大学而又读不起的话,后面奖学金就来了。这是和在美国办学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占半数以上的学生交的学费是比较低的,但它教学的水准、聘请教授的水准却是不能降低的,要跟 NYU 完全一样。现在中国有一些中外合作的大学,它们办下去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师资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待遇,优秀的师资为什么会到上海去呢?有这么高的办学成本,要靠学费收入来赚钱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说它不是为了赚钱。

那么它为什么还要办呢?我从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疑问,现在每个学校都在搞全球化,可 John Sexton(纽约大学校长)为什么要搞成这样一个实体性的全球化呢?现在据我了解,John Sexton 确实是有一种危机感,他觉得美国人如果不走出美国去谈全球化,恐怕是空话。而且纽约这个城市给他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力,纽约大学的空间很小,但它的排名上升得很快,他觉得自己是在这个城市的支持下成长、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现在他需要寻找第二个这样的城市,他在上海找到了这样的感觉。这些都是动力,但是很难讲有什么实质性的动力。全球化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支持它,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感觉到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之间的一种张力,包括民主问题、人权问题,它不像触动意识形态的这一块,而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强盛,经济能够飞速发展。邓小平用他的智慧说不争论,但是不争论不等于说它不存在。现在我们要开放,包括教育也要开放,我们制定的 2010 到 2020 年的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第十六条就专门讲要扩大开放,明确地说要引进国外的好大学。但是同时又有一个限定,引进好大学是放在管理体制这一块的,并不是说要引进这些大学的教育理念,所以它要引进的主要是制度,而没有考虑制度背后还有文化、还有思想。

从内部来讲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紧外松”,这是我们处理所有对外事务的一贯原则,对外是宽松的,对内是紧张的,对内的紧张就是通过我们华东师大,所以我们的地位很尴尬。还有一个就是 Heilmann 教授所说的“试点”、“由点到面”,纲要里面说要合作办几所大学作为试

点,先试试看,好的话就继续办下去,不好的话,当然不会像圣约翰那样赶走,但是可能会慢慢地不了了之。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只能这样回答。至于 Liz 教授说的,美国化其实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提,不提的话可能会更糟糕。上海纽约大学说它培养的学生要具有全球视野,具有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具有世界公民的意识,这些都是它的美好愿望。我想提醒它,促使它向这个美好的愿望去试试看——试试看而已。

温奈良: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Neil,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很关注制度与政策之间的区别。说实话,我从未在这个语境中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有点想当然地认为这类福利计划就是制度。要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它们,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我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考还有缺陷,虽然我对两者的差异有着同样的关注,但我一直都将劳动保险视为一种制度。(戴茂功:看起来就像婚姻制度,各种因素、各种变化都涌入其间,负载着福利政策或移民政策所没有的一种特定的分量,这可能是某种感觉吧,我不知道这是否科学……)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这种分量,但它有一个完整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执行这些政策,这就是思考福利制度时我所想到的东西。

李里峰:谢谢王教授的点评。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在后毛泽东时代,在当代中国,政治运作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极为重要的群众运动,现在无论规模还是重要性都大大减弱了。我想,也许我该使用政治风格或是治理风格(style),而不是治理模式(mode)的概念,如果我们将群众运动视作某种政治风格的话,也许我的观点仍然是有意义的。我认为当代中国政治运作有时候仍然是非制度化而不是制度化的,运动性大于常规性。例如,关于几天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你觉得它不属于运动,可是它的运作方式仍然是运动式的。开展这一运动跟反腐败有关,一般说来,如果要反腐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制度化的措施,例如官员财产公示,让公众知道他们的收入如何、有多少银行存款、有多少套房子,这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反腐败方式。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仍然觉得通过教育干部就可以反腐,而且还明确提倡运动式反腐,所以我认为这

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毛泽东时代一脉相承的,而不是一种常规的或制度化的方法。在此意义上,我觉得也许群众运动仍存在于当代中国。至于 Perry 教授的问题,我想还是留给阎小波教授来回答吧,因为他是我们“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题组的首席专家。

阎小波:Perry 教授提的问题,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来做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研究,如何培养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去做中国政治研究。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研究,这个口号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观察当下中国政治学的生态,我觉得不是太好。它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状态,一部分是比较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一部分是比较西方化的研究。我们有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它每年都会发布大量的课题、招标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是比较意识形态化的,跟当下政治联系得比较紧密,比如最近让大家来研究中国梦,之前要研究科学发展观,等等。另一部分人,可以把他们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比较多地依赖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政治。我们现在考虑,希望我们的研究生在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时候,要对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有一个关注,西方的理论是来自对西方经验的概括,用来解释西方是非常有效的。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偏向,很多年轻人看了西方的理论,比如亨廷顿等人的理论,就用这些理论来套中国的经验,这样的做法是有缺陷的。我们更希望在借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时,也能够利用中国经验对西方的理论进行修正或补充,甚至提炼出一些更契合中国研究的新理论,而不是仅仅对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增加一些案例。我们南京大学的政治学研究团队,现在学缘结构是比较多元化的,有从美国回来的,还有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今年又有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来自各个国家的年轻人,共同来推动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力图把政治学研究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结合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

孙江:我来插一句,接着张老师的发言,university 这个词,当时的耶稣会士从拉丁语翻译成“大学”,其实在拉丁语里面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意思,把它翻译成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应该是有普适性的。现在中国只希望取它技术性

的一面,这就像钱钟书说的,把西方的东西拿一件、砸一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概念史研究,比如政治学,你的那些基本概念是怎么来的,需要仔细梳理。我们经常说一个笑话,说中国有三个传统,一个是西方的传统叫西统,一个是中国的传统叫中统,还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叫马统。我们现在有三个“统”,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本土”?恐怕我们的本土处处都是尘埃,哪里有“土”呢。现在我们——包括李教授在内——想在南京大学搞这样一个项目,研究一百多年来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的一百个关键概念,看它们怎么样影响中国、日本、东亚的历史实践。不从这样正本清源的工作做起,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会变成“一地鸡毛”。

#### 闭幕辞

裴宜理(哈佛大学):断裂还是延续?横跨 1949 年的文化治理

我就简单说几句吧。在座有些人知道,我最近在研究所谓“文化治理”的问题,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就我所知目前只有一位学者 William Callahan 在用这个概念。大家也许知道 Callahan 教授的著作,他在研究中国和其他地区时使用了这个非常福柯式的概念。但我本人在这方面的兴趣,主要在于国家是如何使用象征权力、文化权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威的。

所以我最近完成了这本关于安源的著作,书中 1949 年前和 1949 年后的内容各占一半。我认为在 1949 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在做我称之为文化定位(cultural positioning)的工作。李立三和安源的其他干部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但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和民间文化资源,包括秘密结社在内——让西方理念看起来更中国化。我接着指出,到 1949 年之后,原先的文化定位变成了文化庇护(cultural patronage),中央党政机构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实际控制着整个过程,试图系统地利用文化资源——包括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本国资源和外国资源——使共产主义更具有中国特色。我在书中指出,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过程,1949 年之前我称之为制造(making)中国革命传统,1949 年之后则是一个我称之为采掘(mining)中国革命传统的过程。这是个一语双关

的说法,因为安源确实有一个煤矿,而它又回到那个革命传统,为了党和部分高层领导人的利益,以一种特定的、系统化的方式来利用这一资源。

但是写这本书以来,我一直坚信 1949 年的分水岭或许本不应如此泾渭分明,或许我们不应该认为 1949 年之前是更具自主性、创造性的年代而 1949 年之后并非如此。毕竟,正如 Sebastian 提到的,如果回到 1949 年之前,我们就不得不以 1949 年之前的视角来审视中共的经验。我认为共产党的文化治理类型是和国民党很不相同的,但是当然,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在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安源这个案例之所以如此吸引我,部分是因为在 1923 年到 1925 年——大家知道,当时的安源被称作“中国的小莫斯科”——李立三指出安源的工人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一个苏维埃,只是没用这个名字而已。他们复制苏维埃体制,还发行了货币。到江西苏维埃时期他们创办了正式的银行,由毛泽东的弟弟负责,但在安源时期还只是一个合作社。

所以,中共政权在很早期的时候已经有这些东西了,我们把 1949 年后中国的命运和 1917 年后苏联的命运进行比较其实是犯了个错误,因为中共政权的雏形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回过头来审视文化治理,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因为早在 1920、1930 年代,已经有一个政权在利用各种文化资源,让民众感觉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各不相同,但是对我来说,这种文化治理对于理解(我认为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悖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人们一直在批判这个体制,诸如任人唯亲、腐败、人治取代法治、强制等等,但他们从未批评它不够中国化。相反,他们认为当前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它过于中国化了。由于人治取代法治,我们总是摆脱不了任人唯亲、腐败、强制,这些都是中国特色。事实上,我认为这个政治体制并没有那么中国化。我非常赞同 Bill Kirby 的看法:这个体制和明朝不同,那时没有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即使苏联其实也没有,他们有政治局但没有常务委员会,这是中国的一项发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当然有很重要的区别,但我仍然认为它从制度上看基本上还是一个舶来品,虽然看起来很有中国特色。

因此,我目前的研究想要探讨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当然,大家可以从奥运会这样的壮观场面去观察,也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去观察。最近我在读中宣部的案例汇编——我想他们也许是受了哈佛商学院的启发——他们就如何利用互联网、利用前沿科技来传递信息,做了很多个案研究。我还在关注展览,对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常委参观的“复兴之路”展览很感兴趣,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这个展览其实具有鲜明的安源特色。而且我发现,如果大家仔细观察那些数码藏品,会发现它的整体背景就是刘少奇和安源工人的肖像,这一点让我非常惊讶。

但不管怎样,我相信这些文化资源被创造性地用来营造一种共同体意识,一种民族主义,使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宣部体系而非舶来的共产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大家可以想一想最近中共十八大上高层领导人发表的一些言论。胡锦涛在卸任报告中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他强调“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呼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并多次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站在巨幅长城油画前的著名讲话中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接下来,“复兴之路”展览的前言中写道:“今天,中华民族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华儿女的梦想和追求一定能够实现!”这些语言和文革时期展览中毛泽东所用过的非常相似,但是现在,中华民族正在世界的东方崛起。

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中宣部是怎么做的,文化部通过电影想达到什么目的,等等。2011年有一部电影《建党伟业》,是为了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的,用一种非常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方式刻画了青年毛泽东。这是一部大片,票房超过了当年国内的任何一部电影,超过了排在第二位的《功夫熊猫》。这部影片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共产党运用文化实力的一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1920年代“红色恐怖”和1960年代文革期间“破四旧”的恶意攻击,但是如果读一下中宣部最近的声明,他们认为自己是管家,是中华民族五千

年悠久传统的守护者。

在阅读这些材料时,大家知道——也许大家都知道而我不知道——许多学者认为这是1989年以来中宣部一个全新的转变。1990年代出现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还有几本书考察了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所谓文化民族主义。但是大家知道,其实在1983、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事务了。1989年以后,中宣部发出通知,对两大全国法定节日(五月一日的劳动节和十月一日的国庆节)期间天安门广场悬挂肖像的问题出台了新的政策。过去在两大节日期间,会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悬挂在毛泽东肖像的旁边,但是从今往后,劳动节只能悬挂毛泽东的肖像,国庆节则会加上孙中山的肖像,因为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的全国性革命事业。当然,他们接着说,人们对此可能会有疑问,所以必须澄清我们这样做绝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仍然信奉四项基本原则。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不只是在1989年之后,而是一个在不同时期进行调整和启动的相当系统的过程。我最近在费正清中心做了一场演讲,是由我们以前的一位硕士生主持的,他叫Craig Simons,现在是美国驻中国的一位外交官员。他谈论的是自己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新著《贪食龙》(The devouring dragon),在演讲中三次提到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我举手发言了:“据我的观察和思考,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不是儒教国家。”但是我相信,无论对于中国人理解他们自己的体制、还是外国人思考中国的政治体系,这种文化治理其实都是极为有效的,所以我希望能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认为这个问题也跨越了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鸿沟,也许今天晚餐的时候,李教授能给大家讲讲你组织这个工作坊的一些想法,讲讲我们该如何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开展建设性的对话。我是认真的,你知道,把大家聚在一起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没有听到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展望呢。

〔责任编辑:蒋秋明〕